

三民主義我半月刊

吳敬恆題

第六卷第三期 民國三十四年二月一日出版

三民主義教育哲學述要.....	姜琦
國家起源於武力論.....	陶樾
社會主義心理研究.....	宋國樞
中國鄉治制度的發展.....	陳柏心
戰後經濟建設問題.....	蔣君章
實業計畫蠡測.....	古方
建設新西北芻議.....	羅先高
總理倫敦被難時的靈修.....	陸丹林



# 三民主義教育哲學述要

姜琦

我們所要討論的三民主義的教育哲學，這個命題裏面，分析起來說，本來含有三個問題：(一)什麼是三民主義的教育哲學？(二)為什麼要建設三民主義的教育哲學？(三)怎樣建設三民主義的教育哲學？這三個問題，若再追究起來，又可以改換另一個方式說：(一)什麼是中國教育哲學？(二)為什麼要建設中國教育哲學？(三)怎樣建設中國教育哲學？現在我們爲了談話的起見，姑先來解答「為什麼要建設中國教育哲學」這個問題。因爲我們常有一種懷疑，以爲所謂「教育哲學」，如同科學一樣，是有一種性，並沒有時、空底限制；因此，教育哲學就沒有國界可言而稱之爲「中國教育哲學」。但是這種懷疑是無用的，科學究竟怎樣，而且勿問；至於哲學呢，美國杜威(Dewey)有一句說得好：「社會哲學的產生，一定是在於社會有病的時候；政治哲學的產生，一定是在於政治有病的時候。」(見杜威五大講演，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第二頁)一般哲學或純正哲學究竟怎樣，姑置勿論；但是凡屬於社會(廣義的)哲學之一切特殊哲學如政治哲學、經濟哲學、法律哲學、道德哲學、教育哲學等等，確如杜威所說，都是各該時代和各該社會底產物。因此，凡社會哲學都含有時間性和空間性；再說一句話，它都是含有特殊性。況且，若從邏輯上講來，所謂「特殊」就是一般，它不是與所謂「一般」相悖行的。換句話說，所謂「一般」，一定是由許多特殊事實裏面把握的；假使離開特殊事實，那麼，所謂「一般」，就無所附麗，不啻「空中樓閣」一般。關於這一層之說明，非詳研哲學實不可，現在爲時間所限制，不能詳述，姑且從略。照以上所說，我們也可以說：「教育哲學之產生，一定是在於教育有病的時候」。因此，教育哲學是含有時間性和空間性，再說一句話，它是含有特殊性；但是若從上面所說的邏輯上所謂「特殊就是一般」一句話推論起來，那麼，不拘教育哲學是含有特殊性，然而它仍舊是具有一般性。然則中國教育哲學爲什麼要建設呢？若從上面所說的話看起來，那麼，這個問題，可以不言而喻了。現在我們不妨再積極地說一句話，中國教育哲學是必須要建設的。

三民主義年刊

Education)的教教育哲學；若站在政治的立場上講，它是一種民主主義的教育哲學。又如德國底教育哲學吧，若站在學術的立場上講，它是一種唯心主義或辯證的唯心論的教育哲學；若站在政治的立場上講，它是一種納粹主義(即意譯「國府主義」)的教育哲學。又如蘇俄底教育哲學吧，若站在學術的立場上講，它是一種唯物主義或辯證的唯物論的教育哲學；若站在政治的立場上講，它是一種共產主義(或稱「社會主義」)的教育哲學。除掉英、德、蘇三國之外，其他各國如法、意、日等國，也都有她自身底一種有特殊的性的教育哲學。歐、美各國及蘇聯和日本既如此，若論我們中國，何獨不然？然則我們中國底教育哲學，究竟是什麼樣的一種教育哲學呢？此地我姑先簡單地答覆一句話：無論站在學術的或政治的立場上講，我們中國底教育哲學是一種三民主義的教育哲學。因爲三民主義本身就是哲學同時又是現代中國政治上底一種觀念形態的緣故。(關於「三民主義就是哲學」這個命題，我另有專著，此地恕不詳述。)講到這裏，那麼，前面所舉的「什麼就是中國教育哲學」那一個問題，又已解答了。世界上所有的一切教育哲學，分別起來，祇可以分爲三大派：(一)民主主義的教育哲學，例如英、美、法等國屬之；(二)法西斯主義的教育哲學，例如德、意、日等國屬之；(三)社會主義的教育哲學，例如蘇聯屬之。至於三民主義的教育哲學呢，它本身沒有地位，祇可以附屬於社會主義一派的。這種論說，不但於理論上說不通，並且容易惹起思想紛歧的。先就理論而言，原來三民主義，誰也知道的，是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三者之和，同時，這三者又是互有連環性的。因此，三民主義的教育哲學不妨被視作含有法西斯主義、民主主義、社會主義三派的教育哲學之綜合性。即使遵照「國父在民主主義第一講義」中所說的話：「故民主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即是大同主義」這幾句話作爲根據，那麼，充其量，我們也祇可以說三民主義的教育哲學中的一部分所謂「民生主義的教育哲學」是與蘇聯底社會主義的教育哲學(或名「共產主義的教育哲學」)相類似的。何況，民生主義，照「國父」所指示，也不過認爲在形式上多少是與共產主義相類似，但是在實質上，彼此之間，却是各

三

真其難的。具體地說，共產主義與民生主義二者雖可以稱為「社會主義」，然而在本質上講，前者是以物質（經濟）為歷史的重心，後者是以社會問題為歷史的重心。而社會問題又以生存為重心。國父說：「民生問題就是生存問題。」又說：「民生是社會進化的重心，社會進化又是歷史的重心；歸納到歷史的重心是民生，不是物質。」又說：我們提倡民生主義二十多年，當初詳細研究，反覆思維，總是覺得「民生」這兩個字來包括社會問題，或常用「社會」或「共產」等名詞為適當，而且又切實又明瞭，故採用這個名詞。（見民生主義第一講）照國父意思，他認為社會主義到底底是民生主義中的一部分，並不是民生主義是社會主義的一部分。惟其如此，故國父又說：「社會問題便是民生問題，所以民生主義，便可說是社會主義的本體。」（同上）照國父這一句話推論起來，那麼，我們就可與其餘論者所說，三民主義的教育哲學是附屬於社會主義一派，寧可說社會主義的教育哲學是附屬於三民主義的教育哲學，至少是附屬於民生主義的教育哲學之一派。再進一步說，若照國父所說的「現在各國的社會主義，各有各的主張，所以各國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也是各有不同。」（同上）這幾句話看起來，那麼，我們又可知即使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然而我們中國底社會主義並非就是蘇聯底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由此，更可見三民主義的教育哲學本身自有一種獨立性和地位，就無所謂「誰附屬於誰」的。

以上所說，是就着「民生主義」一詞講到三民主義的教育哲學，至少民生主義的教育哲學與社會主義的教育哲學又是各別的東西而不可混為一談的。現在我再來就三民主義中之「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兩詞與德、意、日、法、西、斯主義和英、美、法底民主主義作一比較性的說明。但是為時間所限制，我也祇能把它很簡略地說明一下吧。先就「民族主義」一詞而論，照國父所指示，他說：「我們民族主義就是民族主義，在中國是適當的，在外國便不適當。外國人說民族和國家便分別，英文中民族的名詞是「Nation」，「哪德」這一個字有兩種解釋：一是民族，一是國家。這一個字雖然有兩個意思，但是他的解釋非常清楚，不容易混亂。……本來民族與國家相互的關係很多，不容易分開，但是當中國實在有一定界限，我們必須分開甚麼是國家，甚麼是民族。」（民族主義第一講）國父這幾句話就是認定三民主義中民族主義是民族主義，並非國家主義。我們可以說前天然力造成的，國家是用武力造成的。用中國的政治歷史來證明，中國人說

：「王道是順乎自然；一換一句話說：『自然力便是王道』。用王道造成的國體，便是民族。武力就是霸道，用霸道造成的國體，便是國家。」（同上）照國父這幾句話看起來，那麼，我們就可知我們中國與德、意、日等國則同是採用「民族主義」（Nationalism）一詞來稱謂，但是在實質上，前者是王道主義，後者是霸道主義。再進一步地說，前者對外講主權，對內講共和；後者對外講侵略，對內講割讓；因此，我們民族主義是與德、意、日等國底法西斯主義雖然有別。

其次，就「民權主義」一詞而論，照國父底意思，他是反對英國洛克（Locke）及法國盧梭（Rousseau）所倡導的「天赋權利說」，乃是認為力量所造成的。國父對於「平等」和「自由」之解釋，就前者論，他說明一種「真平等」的原理（見民權主義第三講）；就後者論，他認為個人不可太過自由，國家要得完全自由。到了國家能夠行動自由，中國便是強盛國度（同上第二講）。惟其如此，故國父在政治上不主張採用英、美、法式的民主制度而另創設五權憲法把「權」和「能」劃分清楚以實行全民政治。其目的是在於排斥個人的自由主義而鞏固其國家底團結力。由此，可見我們底民權主義又是與英、美、法等國底民主主義有不同的。

總括以上所說，我們可以下一個結論，三民主義是含有法西斯主義、民主主義、社會主義三者之綜合性，並非這三者之總和體。因為所謂「綜合」，本是含有「揚棄」的作用；具體地說，三民主義是揚法西斯主義、民主主義、社會主義三者之長處而棄其短處，以另形成為一種獨特的觀念形態。而所謂「總和」，乃是「相加」的意思；具體地說，三民主義並非不經過選擇地保留有的法西斯主義、民主主義、社會主義三者堆積起來而成為一種庸俗東西。再進一步地說，我中華民族本是一個完全的獨立自由之國家，斷非在任何國家如德、意、日、英、美、法、蘇聯等之附庸；因此，我們所有的「民族主義」，「民權主義」，也並非完全地仿效歐美及他各國所有的「三民主義」。由此，更可見三民主義是具有完全獨立性和正堂堂有的。三民主義既然如此，所以我們以三民主義為最高原則而建設之中國教育哲學，也斷非法西斯主義、民主主義、社會主義三派中任何一派的附屬之附屬品或附庸；再積極地說一句話，三民主義的教育哲學也是具有完全的獨立性和正堂堂的地位。講到這裏，那麼，我在前面所提出的「什麼是中國教育哲學」這一個問題又可以完全解決了。

尤有言的，如果照論者所說三民主義的教育學本身是沒有非國非民族的社會主義一派的，那麼，我們就發生錯誤以爲三民主義的教育哲學是非民族的和非民主的，乃祇是社會主義的，尤其祇是共產主義的，不啻好像另有人因不滿意於現實來咒咀三民主義已經陷落於德、意、日式的法西斯主義，或者稱三民主義應當效法於英、美、法的法西斯主義一般，然則我在前面之所稱爲三民主義應當引起思想紛歧者，實基於此。殊不知我在前面已經說過，三民主義是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三者之和，並且這種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又是中國自身所固有之三種主義，並非模仿或抄襲他人的。不過，這三種主義又不滿背世界上各國所共赴之潮流。因此，三民主義，在一方面看來，是有特殊性的，在他方面看來，又是有一般性的；再具體地說句話，三民主義，對內則尊重本國底獨立和自由，對外則與世界各國講求互助和合作的。三民主義既然如此，所以三民主義的教育哲學當然有獨立性同時又有大同性的。現在我敢再肯定地說一句話：中國教育哲學一定是三民主義的教育哲學。

如上所說，我們在適合着我們中國所固有的國情及不違背世界各國所共赴的潮流底原則之下，一定要有並且建設一種三民主義的教育哲學，已經明白了；現在再來討論「怎樣建設三民主義的教育哲學」這一個問題吧。這個問題底範圍很大，如關於教育底本質、目的、方法和價值等問題，都須要討論的；但是現在爲時間所限制，不克備述，祇得姑關於教育底本質問題先作一度簡略的討論，或者同時稍稍涉及教育底目的問題，至於其他等等問題呢？俟諸異日，我再另寫專書「教育哲學」一書來討論吧。

如果我們要問教育尤其中國教育底本質是什麼，那麼，我們須先問三民主義的本質是什麼。因爲三民主義是一切事物如政治、經濟、法律、道德、教育、藝術等等之最高原則；因此，三民主義底本質，就是其他一切事物之本質的總故。然則什麼是三民主義底本質呢？我想誰也知道的，這就是國父所指示的「民生」兩個字。前面說不已經引用過國父自己所說的「民生是社會進化的重心，社會進化又是歷史的重心；歸結到歷史的重心是民生，不是物質」這幾句話嗎？國父還有幾句話說：「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就是經濟的中心，和種種歷史活動的中心，好像天空以內的重心一樣。從前的社會主義，錯誤物質是歷史的重心，所以有了種種紛亂……我們現在要掃除社會問題中的紛亂，便要改正這種錯誤，再不可說物質問題是歷史中的重心

，要把歷史上的政治和社會經濟問題，都歸之於民生問題，以民生爲社會歷史的重心；先把中心的民生問題研究清楚了，然後對於社會問題，才有解決的辦法。」（見民生主義第一講）總之在「三民主義之體系及其實行程序表」上就遵照國父遺教以「民生爲歷史中心」這一句話爲三民主義之原理（第一原理或即本質）。國父這些話，不但否定馬克思認爲經濟（即物質）是一切事物（教育當然也包含在內）之最後的決定要素，並且可以使我們推論起來而認爲杜威所說的「教育就是生活（Education is life itself）」這種主張還有商榷的餘地。此地我先說一句「教育之本質是民生，不是生活」；再短簡地說：「教育就是民生」。（按：此地所謂「民生」一詞，並非「民生主義」之略稱；原來照國父底本意，「民生」與「民生主義」兩詞自有區別的，即前者指事物之本質而言，它的內容含有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羣衆的生命；後者指事物之一部分的現象而言，它底內容含有節制資本、平均地權和國營實業；再換句話，前者含有經濟的和非經濟的成分，後者祇是純經濟的。欲知其詳，還請參考拙作「民生與民生主義底界說之研究」一文，見「中國青年」第十一卷第五、六兩期。）

照上面所說，中國教育哲學上所謂的「教育就是民生」這種主張與杜威底教育哲學上所謂的「教育就是生活」那種主張究竟有怎樣的差異呢？先就國民的生計而論，照國父所指示，民生的內容是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羣衆的生命。（見民生主義第一講）就中，國父所謂「生活」和「生計」二者是含有經濟（物質）的意味；再分析地說，所謂「生活」是指日常（即每天）之活動（即講求食、衣、住、行、樂、育）而言；所謂「生計」（即經濟），是指今後（即明日或將來）之計劃（即講求生產、節約、儲蓄）而言的。復次，國父所謂「生存」和「生命」二者含有非經濟（精神）的意味；再分析地說，所謂「生存」，是指當時（也即每天）之存在（即講求禮、義、廉、恥）而言；所謂「生命」，是指後代（即永遠的將來）之延續（即講求種族保存和人類不滅）而言的。這四者之中，因爲食、衣、住、行四大需要，廣義地說，食、衣、住、行、樂、育六大需要，無論何人，是不可須與離的；然而其目的還是在於求社會和人類底生存，即講求

「義、廉、恥。」關於禮、義、廉、恥四字之解釋，另詳專論，此地姑不敘述。○否則，人類若祇知道講求食、衣、住、行、樂、育而不知道其所以食、衣、住、行、樂、育之道理，終日懵懵懂懂，好像「醉生夢死」的模樣，那麼，這是禽獸般生活，並不是人類真生活。惟其如此，故 國父認為民生問題就是生存問題。國父更引用一位英國學者底主張，說：「古今人類的努力，都是求解決自己的生存問題；人類學決定生存問題，才是社會進化的定律，乃是歷史的重心。」（同上）不過，因為生活（即講食、衣、住、行、樂、育）總在我們底目前而有具體的表現，並不像生存、生計和生命三者帶有抽象的性質，所以 總裁說：「民生雖分四個方面，而生活實為其他三者之總表現。發生在保障，生計或繁榮，生命或繁衍，而凡為達成保障，發展與繁榮之種種行為，便是生活。換言之，生活即是人生一切活動的總稱。」（見「新生活運動綱要」民國二十三年五月十五日）總裁這種解釋與 國父遺教並沒有何等衝突，因為 國父所說的話是指生活之所以然的道理而言；總裁所說的話是指生存、生計、和生命三者之總表現而言的；彼此所解釋之出發點雖則不同，然而其結論語還是一樣的。再具體地說句話，無論 國父或 總裁，他們都認為所謂「民生」是歷史底重心或中心之總個體，不過為說明或談話便利起見，把它分做四個方面而已。如果我們不明白這種意思，一聽見 國父所說的「民生問題就是生存問題」這一句話，就斷定「教育就是生活」，那麼，像前者底說法，不免有「唯心論」之嫌，像後者說法，又不免有「唯物論」或「唯用論」之嫌；合言之，這兩種說法，都不免有違背 國父遺教和 總裁言論底本意之疑義。惟其如此，故我為要避免這種嫌疑起見，無論如何，非說：「教育就是民生」不可。不過，我們有時為說明談話便利起見，也不妨引伸地說：「教育就是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羣衆的生命」。像我這樣的說法，還不是一種「唯心論」，也不是「一種「唯物論」或「唯用論」，乃是一種「民生哲學」。（關於「民生哲學」之說明，請研讀 總裁「三民主義之體系及其實行程序」一書，便知其詳的。）

此地還有幾句話要說明的，就是所謂「民生」一詞無論合稱之為「民

生」，或分稱之為「生活」、「生存」、「生計」和「生命」，都是「生長」的意思。 國父在民生主義第一講裏面開宗明義地說：「『民生』兩個字是中國向來用慣了的一個名詞；我們常說甚麼國計民生，不過我們所用的這句話，怕多是信口而出，不求甚解，未見得含有多少意義的。但是今日科學大明，在科學範圍之內，拿這個名詞來用於社會經濟上，就覺得是意義無窮了。我今天就拿這個名詞來下個定義，可以說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羣衆的生命。」 國父這幾句話，就是指示着「民生」一詞之「生」字並非指一切事物祇停止在原始形體而活動而言，乃是含有「生生不已，變化無窮」的意思。若溯本追源， 國父所謂的「民生」一詞之「生」字，實淵源於易繫辭上所謂的「生生之謂易」這一句話而演繹出來的。孔穎達曾把「易」之一字解作「生生不停，漸漸相續」之義。由此，可見凡可以稱為「生」字之一切事物，不拘其為「生活」、「生存」、「生計」或「生命」，都是含有似易繫辭本身所謂的「易」（即變化）和孔穎達所解釋的「生生不停，漸漸相續」的意思。所謂「生活」、「生存」和「生命」三詞，顧名思義，不消說是含有「生長」的意味，因為這三個名詞，在平時大都是應用於生物的方面的緣故，就是「生計」這一個名詞，也何嘗不是含有「生長」的意味呢？西洋有一位哲學者名叫赫克爾（Haeckel），擅長造字造術。他給生物學底這一分支起名叫 *Ecology*（生態學），它和 *Ecology*（經濟）及 *Ecronomics*（經濟學）都是由同一希臘底語根轉變而來的。（見哲學雜誌第八一頁）原來英語 *Ecology* 可以譯做「經濟」，同時又可譯做「生計」；而所謂「經濟」，既如赫克爾所解釋，是與「生態學」一詞有同一的語根，所以我們所謂的「生計」一詞之「生」字，當然也是含有生物底生長性的意思。綜合以上所說，所謂「生活」、「生存」、「生計」和「生命」四者都是含有「生長」的意味；再說一句話，民生就是生長。這不會好像杜威以為生活就是發展，發展、生長就是生活（Our out conclusion is that life is development, and that development, growth, is life.）一說。（見 T. Dewey, Democracy and Education, p. 59）

（下期待續）

# 國家起源於武力論

陶 撰

國家從何而起源？這在政治學上是至今尚不易解決的難題。照理這個問題該從歷史中去求得解決；但是歷史却坦負不了這一重大的任務，原因是歷史是人預有了文字以後的事實記載，在文字尚未發明以前的社會究爲如何狀態，歷史亦難想或推測，不能給予我們以可靠的指示。因之，關於國家的起源大半是屬於理論或哲學的範疇，所見紛紜，莫衷一是，大概說來，其最流行的學說不外乎神權說、社會契約說、家庭起源說、及武力說四種。

神權說謂國家由上帝或神意所創造，這自然是一種無稽之談，毋待深論，試如美國政治學者格爾泰（Gierke）所批評：「在現代政治學說上，它是沒有地位了。無論權力或人性的最後來源是什麼，國家總是一種人爲的制衡；國家的法律由人所創造，並且由人所實施」（註一）。蓋在民智未開的時代，神權說尚有存在的餘地；但是到了今日民權的時代，神權及依附於神權的君權自然都已喪失地位，還是不容置議的事。數次社會契約說的學者，除了洛布思（Lobbes）以外，洛克（Locke）與盧梭（Rousseau）都是提倡民權的先驅者，其理論後來竟成爲法革命的動力，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然則契約說在學說本身却是一種錯誤的言論及虛空的構思。就是國家由人與人間訂了契約而造，非但在歷史上毫無根據，且與邏輯或理則亦不相符合。英國法學家卜洛克爵士（Sir Frederick Pollock）批評契約說爲「一種『最成功的也是最要不得的政治欺騙』（註二）」，真是再恰當也沒有，至於家庭起源說則謂：「原始社會是一個家庭的組織，漸由家庭演進而成爲國家。在此說學者看來，國家不是人類創造之物，而是積累長明歷史的經驗，逐步自然成長的制度或組織，故由此說擴大即變爲歷史或演進說。家庭起源說雖在十九世紀末葉頗爲流行，一般都相信這是歷史學家對於國家起源論的

偉大貢獻。但是時至今日，這種學說亦已被認爲僅有極少或甚至毫無科學的價值。它所採取的方法論既然錯誤，而其對於社會演進的解釋，亦多偏激之詞，不足徵信（註三）；祇要看他們對於最早家庭爲父系抑或母系一點，尚且未能獲得一致的結論（註四），即可知此說實僅爲哲學的假說，而非科學的真理。因此現今一般最進步的人類學家，如德阿斯（De Meo）、路威（L. Vico）、萊斯勒（Wheeler）、郭屯維塞（Coudwiler）、克洛勃（Krober）等，都反對父系說及母系說（註五）。他們採用正確的歸納方法，從各自觀察所得的具體材料中演爲一般的結論，無不證明在社會制度的演進方面，並無一成不變的普遍趨勢。古代社會中實無母系及父系家庭一定連續發生的真正跡象，母系社會與低落文化既沒有連帶關係，父系社會與較高的物質文明也沒有密切的關連。人類儘可從地方團體一變而爲獨立國家，不必定須經過母系及父系家族組織的階段。而且我們如果再從家庭與國家的要素、組織、功能、及目的各方面來看，就可發見兩者是完全不相稱的。謂爲國家必起源於家庭或是由家庭所擴大的組織，顯無充分的理由（註六）。故美國著名公法學家韋爾貝（W. W. Willoughby）竟簡捷了當地說：「還在我們看來，乃是一種錯誤」（註七）。

綜上所論，便知國家既非由上帝所創造，亦非由契約所建立，更非由家庭起源而來。那末國家的起源究竟是怎樣的呢？我們的最後答覆是國家乃起源於武力或武力所造成。國父在民族主義第一講中說明民族與國家的區別時說道：「民族是由於天然力造成的，國家是用武力造成的。……所以一個團體，由於王道自然力結合而成的是民族，由於霸道人爲力結合而成的便是國家。」國父又肯定地說：「自古至今，造成國家沒有不用霸道的。」國父這種說法不僅與自古至今的歷史事實，完全相符，抑且與現代最顯

步的社會學家主張，適相吻合。所以我們深信武力說是解釋國家起源之一種最正確合理的理論。

什麼是武力呢？用簡單的話來說明：這種學說乃發見國家是起源於弱者對於強者的服從，國家的產生是武力壓服的结果，其最先出現時，必有一人恃其體力或其他能力的優越，領導眾人，束縛西討，實行兼併，於是原始社會的範圍隨着戰爭的勝利而日益擴大，同時社會的組織亦日臻嚴密，那個勝利者即儼然為團體的唯一領袖，使原在政治上無組織的羣衆聽命其支配，這樣便出現了一個最高的政治權力，國家乃由此而造成。

最早做武力說的是十六世紀初葉的義大利佛羅倫薩（Florence）人馬基維尼（Machiavelli）。馬氏於其二十九年的從政經驗，罷官下野以後，著「王者」（The Prince）等書，認為君主之責任唯能救國，為了保持國家的生存，他儘可不擇手段，講究藝術，但是馬氏的理論僅重在以強力作為治國之道，而並沒有強調強利是國家的起源。所以嚴格說來，馬氏實不能稱為主張國家武力起源說的學者。當十八世紀契約說盛行之時，有一位英國哲學家休謨（David Hume）最先排斥契約說，另立武力說，他稱得上是最早提出武力說的有系統理論之一人。休謨雖公認爲英國功利主義的鼻祖，然其理論的出發點却爲武力，最後纔歸納到功利上面。他說初民的結合也許可說是由於公共的同意，因爲沒有人擁有充分的武力，足以強迫別人服從他的；但還絕不是正式的契約，因爲以當時人的知識程度而言，顯然還不會有契約的觀念。最早政府之所以能夠成立，由於人民的不得不服從，漸漸地服從便成了習慣，大多數人都樂於遵循他們祖先的行爲，服從家庭及政府。政府組織的一切變化——即爲進步，如帝國的建立，歷史悠久國家的消滅，殖民地的開拓及人民的移居等，諸如此類的事實，如果說是由於君主與人民間的同意而來，休謨以爲那是找七百人中的大多數來確定數千萬人的政府，數千萬人不過是俯首默認而已。照休謨看來，「人人都是狡猾的無賴」（Every man must be supposed a knave），人類行爲的決定動機便是「實利」（Self-interest），人民爲什麼不能不服從政府呢？就是因爲不能不服從，社會便不能存在，換言之：在人民方面說，服從比不服從所能得到的實利來得多些（註八）。這種說法即顯示休謨的功利主義的論調。

休謨稍後，又有一英國哲學家弗格遜（Adam Ferguson）受了休謨的影響，繼續發揮武力說。他認爲國家的起源、政策、以及政府的秩序，俱決定於環境，與哲學家的空想實無關係。人類之間及社會之間的敵對和衝突，不僅是難力可避免的，而且也是有的。如果民族之間沒有戰爭和戰鬥的事實，則國家社會的本身就不到一個目的或一種體制。力量是進步的必要條件，需要力的生活是人的正常生活。公民自由與經濟繁榮大都是政治與軍事戰爭的始料不及的產物。弗氏即適用此項原則，以解釋社會與政府的起源。他認本體與習慣不是理性與計畫，創造了社會體制。人類僅在生存方面是平等的，各人的能力則隨性質與效率而異，所以等級的差別乃是社會團體的特徵。政府的體制與權力是決定於鬥爭的偶然事變，基於此點，故弗氏對於政治組織之成立乃適應於促進文化及德行之說，極予輕視，在他看來，自利是各國決定其組織及政策的動機，道德和知識的增進，不過是一種副產物而已。可是弗氏一方面雖以爲社會的權威在事實上是操於優勝者或優勝階級的手中；而另一方面却又承認權威僅限於防止惡習；國家體制與法律的成立，必須隨時取得人民的同意，藉以矯正或防止權力的濫用。由此可見弗氏雖然鼓吹武力說；但觀其理論發展的傾向，似仍依稀回復到洛克式的契約說。弗氏之未能完全擺脫十八世紀契約說思想的桎梏，實至明顯（註九）。

集武力說之大成的應推十九世紀上半葉的德國瑞士學者哈勃（Carl von Hübner）（註十）。他曾著有「政治學原論」（Rechtshistorie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一書，開揚其說，他和休謨一樣，也是極力反對契約說之一人。他乾脆承認人類是天然不平等的。有關正義與仁愛的神法與自然法，固然確定人人都應有同樣的權利；但是關於滿足日常生活需要的權力及關於這種需要的種類及數量，則在各人是不相同的，也是不平等的。在哈勃看來，這種情形便是社會關係整個系統的鎖鑰。唯其這樣，於是誰能有獨立滿足其本身需要並且又能幫助他人亦同樣滿足需要的權力或財富，誰便是天然的治者；而那批依賴他的人便是天然的臣民。哈勃不但應用這個原則以解釋政府的權力；並且同時拿來說明人類各種權力的關係，例如兒童之於成年人，弱者之於強者，愚者之於智者，窮人之於富人，學者之於教師，病人之下醫生等等關係，在人類社會上充滿了這類差別的關係，這就是說：一方面是以統治，一方面是以服從。至於政治的權力，雖與它種權力不同，但祇是程度上的差異，而非種類的懸殊。在政治權力方面，必有一人因有先天或後天得來的特

力、實力、智力或其它性能，能够不按照個人、部落本身及他人的需要，於是把那一羣被調劑的人結合起來，自然成爲一個團體，我們便得這個團體爲政治社會。或者還有一種情形，由一批權力研等及同樣獨立不依的人，有意團結起來，以促進他們共同的利益，選擇便吸引一批權力與獨立性的精進的人或來參加，接受統治，亦組成一政治社會。哈勒稱謂一種情形爲君主制 (Monarchism)，後一種情形爲共和國 (Republic)，除了這兩種體制以外，再沒有其它可能的體制。

哈勒的武力說有一個特點，他以為這些現象都是無可避免的自然大原則 (Great principle of nature) 最顯者即使他自己不願治人，但事實却非使他治人不可，弱者雖亦希望自由，未必願意受人，論爲可憐的臣民；但其勢亦役於人而爲臣民不可。總之，據哈勒的見解，個人之所以結合爲一國家，蓋抱有共同的目的，即在獲得生存與保護等項條件。故主權者在執行任務時，不得損害但須促進國民的權利，且其職法雖足但不必增加國民的權要。不過哈勒同時又認爲主權者僅受道德法 (即自然法與神法) 的約束，他最後的結論甚至維護「國產君有的君主政體」(「National monarchy」)。(註十一)

這樣完全露出革命的真相，顯然是爲專制君主制護之嫌。爲了這一原則，哈勒的學說便無怪乎許多學者的攻擊(註十二)。到了十九世紀末葉，又有一個德國學者柴西克 (Treichke) 亦鼓吹武力說，他同樣認國家的起源是由於戰爭及武力的征服(註十三)。不過柴西克的理論中心並不專在從歷史上去探究國家的起源，而其目的是在證明權力是國家最主要的特性，從而提出其絕對的國家主權論。所以柴西克的重點是在解釋國家根據武力的合法性，這可以說是後來德國學者哲學思想的一項特色，如著名公法學家耶律西克 (Jellinek) 亦曾發表過類似的論調，而倫德智利 (Lundström) 雖然以爲武力所造成向國家往往不穩固和維持持久；但他因不滿柴西克之說，亦不免稱武力說爲「理論的危險」(「a mainum of faith」)。(註十四)

承認武力是國家的必不可缺少的原素(註十四)說，是與現代最進步的社會學主張相吻合，這話怎講呢？我們知道武力是社會學家的思想，而且也是現代社會學名也是研究得最一致的意思，如波蘭人哥登洛維茲 (Gundlowicz) 的

ndorf)。德國人奧本海歐 (Oppenheimer) 美國人萊德 (Lester F. Ward) 及斯毛爾 (Alfred W. Small)、英國人麥克斯 (Edward Jenkins) 等，都一致相信戰爭是產生國家的主因，換言之：武力是造成國家的原動力，這是他們經過精密調查、觀察、及研究後所得的結論，其理論的根據感無比，無誤的，較諸休談、弗格遜、及哈勒的哲學思想，自更可信而有徵。

但是不可諱言的，現代學者反對武力說的，當亦實繁有徒。例如萊羅貝說：「武力說主張強權本身就是一种保護，這是要惹起無窮的問題的一個無效的嘗試，不需要我們駁斥的」(註十五)。大概反對的人第一言新定武力說的主張「強權即公理」(「Might is Right」)，於是針對這一自我演繹的目標，予以猛烈的攻擊，認爲這是一種極端危險的思想。若批評者之所以不滿武力說，祇因他們犯了一個共同的錯誤，把國家起源與國家根據兩個問題混爲一談，而且若干學者又往往以爲武力說僅僅主張把武力當作國家根據，因而拿出證據反對強力的話，來予以反駁(註十六)，如萊羅貝即爲一例。其實，武力說固主張國家起源於武力，但它不一定同時認爲國家的根據亦在武力，換言之：國家存在的理由及國家之要求人民承認與服從，未必是以武力爲唯一的憑藉。

高明瞭武力說的真義起見，我們對此說再分三點申論如下：第一、說國家由武力所造成，其意並非謂國家之產生乃爲一朝一夕之事。誠如哈勒所說：「國家是一完備的社會結合」。這種結合當然是經過長期的演進而來的，不過在演進的過程中，武力是最顯著最主要的因素。什麼叫武力呢？武力就是國父所說的「權的作用」，人類爲要維持生存，便與奮鬥；而奮鬥的工具便是「權」。所以國父說：「權」是人類用來奮鬥，人類由奮鬥而生，至於現在，天天都是在奮鬥之中」(註十七)。奮鬥的結果，始產生一個穩定的政治權力，亦即國家的組織，照此說來，我們便知武力或與進化論並不衝突。因之國父一方面認國家是由武力所造成；而另一方面又相信國家是由於人類求生存的必要上，逐步進化而來的。國父把人類奮鬥分爲四個時期：一、是洪荒時代，人類同獸爭，是用氣力。二是神權時代，人類同天爭，是人民同君主爭，可以說是將人類同獸人爭，公理同強權爭，是說的四個時代既是人類奮鬥的階段，也是政治進化的經過與

政治社會的由來。在洪荒時代，人類文化未開，還把毒蛇猛獸殺完之後，人類進於畜牧時代，始有初生的人類，大家擁護一個得個神道設教的極頑聰明的人做首領，這首領，直至君權時代，於是真正統一的國家方始出現。由此可見得武力說與進化論非特沒有衝突，而且相輔相成。我們唯有將這兩種理論配合起來，才能確實認識國家的起源。

第二、武力不但是造成國家的原動力，而且也是現代國家所應具備的一種極重要的生命力。我們知道一個國家如果沒有充分的國防，那末這個國家即沒有自衛的能力，沒有自衛的能力即等於沒有立國的基礎，這個國家便一定經不起國際生存的競爭，終必趨於淘汰無疑。然而武力固然是立國的要案，却不是國家要求人民服從的根據。人民之所以需要國家的組織，主要原因是在於國家能替人民謀幸福（註十八）。要達到這個目的，國家固然不能不具備充足的武力，內維秩序，外抗侵略，於是人民始能安居樂業。然而武力是剷除惡害的工具，而絕不是製造惡害的手段，一國政府決不可利用國家的武力，對內壓制人民，對外發動侵略戰爭，濫藉此種工具或手段，為非作歹，禍國殃民，並使全人類受無窮的損害與苦難。須知政府統治權之由來是法律的，而不是武力的，換言之，是法治的，而不是專制獨裁的。維持政府法令的效力，武力祇能說是一個表面的現象，實際上則仍須賴道德的力量，方足使全民心悅誠服；夫如是政府之基礎始能趨於鞏固，這樣的政府纔是真正有民治民享的政府，現代民權政治之所以可貴，蓋即在此。

第三、我們贊成武力說，祇因事實上國家確實起源於武力。我們自然應該重視事實，不可作違反事實的言論。不過我們必須注意的一點，武力說絕無鼓吹武力萬能之意。相反的我，應在此說所根據的事實之外，同時還抱負一個遠大的理想。這是說：國家雖由武力所造成，在國家造成之後，雖仍不能不靠武力以維持生存，這些都是事實；但是我們的理想却不始希圖逐漸消滅各國的武力，即逐漸消滅各國現有的軍備，僅以維持一國內治安所需者為度。人類如果還需要武力的話，則應使其國際化，並且轉個方向，須用於防止侵略及戰爭的暴行上面。這樣，全世界便可能永無不再發生那滅絕人

服的一種不幸事實，於是正義與永久的和平，始得樹立一門應該認識清楚，戰爭或武力的濫用，原是人類從初生時，鬥性行為。這就是 國父所說的：「由動物變到人類，至今還不久，所以人的本質，便是動物，所賦的天性，便有多少動物的性質，換一句話說，就是人本來是獸，所以帶有多少獸性，人性很少」（註十九）。可是我們人類難道是以這種獸性行為為滿足麼？不！決不是的！ 國父又說：「我們人類進步，是在這就高尚的人格，要人類有高尚的人格，就在減少獸性，增多人性，沒有獸性，自然不至於作惡，完全是人性，自覺道德高尚，所做的事情，自然是向軌道而行，日日求進步」（註二十）。依據 國父的意見，人類不但要有完全的人性，並且更要進一步求神性的發生。 國父說：「是欲欲造成人格，必當消滅獸性，發生神性，那樣，纔是人類進步到了極點」（註二十一）。人類既應消滅獸性，增多人性及發生神性，那末當然不可再以武力為尚，因為人類畢竟是具有理性的動物，豈可仍似禽獸之自相殘殺？ 國父說得很對：「物種以競爭為原則，人類則以互助為原則，社會國家者，互助之倫也；道德仁義者，互助之用也」（註二十二）。所以我們在社會結合和國家成立之後，人與人之間實應講求互助，仁義、道德、不應繼續崇尚武力，競爭，侵略，征服等事，如此則世界大同的理想當亦不難實現。這是 國父的人性論和武力說比之西洋學者的思想更進步獨到之處，值得我們服膺其偉大三民主義的同志們努力闡揚，以喚起全世界人士予以深切注意的。

附註：

- (註一) Gertel,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cience," p. 51
- (註二) Pollock, "History of Science of Politics," p. 75
- (註三) Merham, Barnes and Citrus, "History of Political Theories, Its Evolution," p. 366
- (註四) 梅因 (Sir Henry Maine), 斯賓塞 (Herbert Spencer) 等主父系說。但白旭芬 (T. T. Buchanan), 麥克萊能 (T. P. McLean), 毛根 (Lu. H. Morgan), 亞克斯 (Edwina Teale) 等則

主母系說。

- (註五) 參閱 Boas, "Mind of Primitive Man"; Lowie, "Primitive Society" and "Culture and Ethnology"; Wisler, "Man and Culture"; Gerdnerweiser, "To emen" and "Early Civilization"; Kroeber, "Anthropology";
- (註六) Garner,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cience, P. 119";
- (註七) Willoughby, "Nature of State," P. 20
- (註八) Home, "Essays, moral, Political and Literary," Vol. I
- (註九) Farnham, "Essay on Civil Society";
- (註十) 哈勃為生於伯爾尼 (Berne) 的德意志人，任伯爾尼大學公法教授
- (註十一) 哈勃將君主政體分為三種：(一) 國產君有的君主政體；(二) 軍事君主政體。(三) 精神君主政體。但他以為最後均將變成第一種君主政體。
- (註十二) 參閱 Dunning, "Political Theories from Loesseau to Spencer," Pp. 195-216
- Loesseau, "Elemento of Political Science," Pp. 36-37
- Cetelli,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cience," P. 79
- (註十三) Treitschke, "Politik"
- (註十四) Buntshli, "Theory of State," bk IV, chap. VIII
- (註十五) Waring, "Nature of State," P. 41
- (註十六) 盧梭曾說：「強力是一種物質的勢力，我不以為它會產生道德。屈從強力是不得不然的行為，不是願意的行為，而多至是一種審慎的行為，試問它怎樣能變成一種義務呢？」——Contract Social, L'Esprit J, Cha, III
- (註十七) 國父民權主義第一講。
- (註十八) 國父說：「國家的大作用，就是設官分治，替人民謀幸福的。」見「國父要以人格救國」演講。
- (註十九) (註二十) (註二十一) 俱見「國父以人格救國」演講。
- (註二十二) 見「孫文學說」。

(上接十五頁)

就環境造成人類所追求的目的而言，最作為典型者即是智識界的反動，為補償其不滿的心理起見，創造各種法律思想與革命思想。勞工社會主義運動，應視為上述兩種反動所混合構成的結果，如果承認這種社會主義實現階級利益，做表現勞工界的一塊利心，僅是勞工適應資本社會物質生活的各種條件，如果如此，那末，我們可以借用蕭伯納的一句話而名之曰，「勞工階級的資本主義」。但是勞工運動，應該具有更偉大的目的，而這些目的，全是從勞工不肯適應其經濟地位的心理中產生的。勞工運動，愈趨趨向於這些目的，愈是真正社會主義化。

在情感方面言，勞工階級信仰社會主義的趨向，係產生於兩種的因素，一是環境，二是動向。環境就是人類對社會經驗所有印象的總和，動向即是人類在智識與精神方面，對這些社會印象發生的反動。這些動向，反乎馬克思主義之所想像，不是從社會裏產生的。這些動向，反乎自然哲學之所信仰，並不適合於一個永遠不變的人性。這些動向，含有一種天性的成因，可視為與人的天性俱來的，但其表現的形式，則因習慣不同而變化，同時亦受着歷史環境長時時變動的影響。資本主義並不創造一種資本主義化的動向，就是說資本主義，並不使人類，由於一種簡單的適應，完全適合於這種適應在心理上的要求。因為不然而的話，社會主義，決不能在資本主義外存在。反之，在資本主義以前，早有許多，已養成定型的性格，這類性格之養成，係由於生長的定向，或由於對前社會形態發生習慣性的反動而來。

是故任何勞工運動之社會學，應首先以孤獨生活之工人為典型，研究其原有的情感形態，即是研究從正常生活與工作環境影響中產生出來的典型。這種研究，還可以縮小範圍，注意於一個特殊的典型，例如一個小工人工人，或一個大工人工人，如此收益更多。此外，勞工運動所包括之工人種類，誠有女工、農工、店夥、公證員、獨立的小生產家庭等，這些人的生活條件，與其心理性質，當然與作為典型的工廠工人，在若干方面，有許多不同，但工廠工人，不獨是代表一個人數最多的類別，而且是代表一個最富有勞動階級共同性質的類別。

我們以後就拿工廠工人作為研究的對象，進而探討階級鬥爭的心理因素，與階級鬥爭的結果。(待續)

# 社會主義心理研究

宋國樞

戰前比利時工黨領袖亨利德雷 Henri de Man 早年留學德國，醉心於馬克斯主義，曾於一九〇五年起，任德不齊格城社會主義日報編輯。迨畢業返比，恆致力於工黨組織工作，旋任比京勞工高等學校校長，對勞工運動之理論，貢獻尤大。一九一四年，荷德交兵，亨利德雷投筆從戎，停戰後返美遊歷二年始歸，自一九二二年後，潛心著作，不問外事。這位馬克斯主義者，因受戰爭創痛，復見一國勞工志氣，乃對平素信仰之主義，從新切實檢討，撰成一部傑作，「社會主義心理研究」，於一九二六年問世，當時歐洲各國學者，競將譯成本國文字，並著批評，即年逾七旬之馬克斯主義元老卡爾柯柯斯基，亦不辭辛苦，對亨利德雷之說，提出反詰。雖然，亨利德雷一生信仰社會主義，並致力於勞工運動，固無人得以反動視之。我人檢閱其著述，覺其批評馬克斯之處，實有裨益與實際上之裨益，足供三民主義者之參攷。惜原書譯本，長凡四百五十頁，筆於翻譯，每想據法國里昂大學教授安德烈非利和所作簡略，草草數萬，仍用原書名目，在本刊發表。

## 【一】論階級鬥爭的原因

1. 緒言

現在社會主義的理論，正遭遇着危機，而據來視為完善社會主義之馬克斯主義，更到處受着攻擊。我們知道在第一大戰以前，各方以修正馬克斯主義為企圖的運動，早已蓬蓬勃勃，當時會發現兩種不同的思想主流：一為塔爾斯斯坦 Bernstein 的修正主義；一為沙賓爾 C. Snow 的革命同盟組合

主義。這兩種主義，足以證明馬克斯主義，正在解體。塔爾斯斯坦和沙賓爾兩派，均根據最新的經濟學說，批評馬克斯主義，並認定馬克斯的勢力價值與剩餘價值兩個觀念，已成為薄弱無力的理論。他們更說明：一方面，馬克斯預言的工業集中，固然有逐漸實現的趨向，嗣至補進工業與財政界的獨裁制，但他方面，這種趨向，不獨不增加一般民衆的貧苦，反促使勞動界之命運，逐漸改善。他們對下列一點，尤其注意：即依照馬克斯的預料，經濟危機，行將層出不窮，成為「最後災禍」的前驅者，但就現在情況而言，經濟危機，不獨不被前變本加厲，反有穩定資本主義的趨向。

自我人觀之，上述批評馬克斯主義之種種，今已不足為有力之理據。戰後社會主義青年，對馬克斯主義的指責，非指責其在經濟方面，實作若干既不正確又不能配合現代進化的肯定，他們所指責者，厥為馬克斯主義階級性的思想方式，及其取巧的行動方式。按馬克斯主義，素以尊重人格，提高人格自傲，今則反使人陷於失望的宿命論之下，而無法自拔。馬克斯主義素以解放人類自傲，今則為求人類之解放，造成一般民衆慘利是圖之風氣。馬克斯主義在原則上肯定一個完整革命的必要性，今則在實際上備行一種聯合陣線的、溫和的、妥協的政策。故現在之成為問題者，不僅是馬克斯主義肯定之正確與否，而是馬克斯方法論的價值問題。我們知道馬克斯會應用這一個方法論，綜合社會主義的理想與勞動階級的利益，並將一種理論論，變成行動力量。這一個方法論，就是他的唯物史觀。

我們先敘述馬克斯理論的基本要點，再進而提出幾個反駁。

3. 馬克斯階級鬥爭觀念說明：

依照馬克斯主義，階級鬥爭，為資本制度下剝削勞工的事實所產生。一個必然的，與無可避免的後果。他說，任何企業，其所生產的貨品，均依勞力價值出售。即依生產所需社會勞力之總點計算，而代表勞力的貨物，則是被再生產所需社會勞力之總點計算出，換句話說，工資標準的確定，是依工人維持家庭生活必需的最低點計算，但事實上，在任何生產事業中，工人所生產之財富，多於工人所得以維持生活之財富，生產與消費之差，造成剩餘價值，這個剩餘價值，在現在的社會組織裏，被「無產階級」的資產階級所佔。因此之故，勞動者與資本家之間，常存一種無法避免的利害衝突。如果工資增加，則剩餘價值減少，如果欲增加剩餘價值，惟有減少工資。一旦勞動者了解這個利害衝突，階級鬥爭即由此發生。

此外，資本社會本身的進化，也促成剩餘價值。各種企業與資產，行將趨集於中，同時，因企業與資產的迅速集中，小企業全被沒收，中產階級逐漸趨於，而一般民衆的貧苦情況，變本加厲，其結果，階級間的衝突，不停地尖銳化，失業工人既多，從業的勞動者，出於迫不得已，祇得接受最低的工資，不能購回其勞力所生產之物品，而資本化的高潮，遂激起生產過剩之危機，促使工業組織日益紊亂。馬克斯預言，生產的力量，將被動革命，以反抗其占資產之現在方式。於是資本制度，循其本身自然進化之規則，將無法避免其滅亡。

階級鬥爭，本是爭取剩餘價值的鬥爭，本是一種生產方式和一種經濟關係直接產生的結果，無法可以避。此點為唯物史觀的中心思想，我人應加以檢討。不過馬克斯的思想，往往被人曲解，甚至誤解，同時，馬克斯思想，既亦與時進化，故我人不得不追溯原委。「共產黨宣言」可說是革命信條的座右銘，馬克斯在選讀文字裏，曾以簡單的語句，概括許多的認識，並反對原有的各種社會主義學說。其說明唯物史觀之方式，最為粗率。略謂經濟的進化，尤其技術的進化，絕對的確定社會的現狀，而在工業技術之現狀下，社會主義，必然獲得勝利，但其間人的力量，直等於零，因為他們的這種思想，宗教信仰，法律觀念等等，都僅是一種理論的上層建築，亦即是經濟生活的反映，惟有經濟生活，纔是實際。

但不久以後，馬克斯決意修正其最初的觀念，而在其思想體系裏，對於

人的活動，給予應有的地位。自一八六二年，他在前卷二百十八頁寫道：「人類能創造自己的歷史，但總成歷史的史料，不是完全由自己供給的，不是從人自己選定的環境中得來的，而是從已有的環境裏獲得的。過去時代的傳統思想，常有力地影響現代人的頭腦。」他又在「反猶教義」書裏寫道：「蒲魯東先生十分了解：人類依照編織的生產關係，製造原料，布料及絲綢。但他未能了解的：是這些確定的社會關係，和布與織，同樣地與生產有關。一旦人獲得新的生產力量，及變更其生產方式，則所有的社會關係，亦將為之完全變更。」最後，馬克斯之同事恩格斯（Engels）對於唯物史觀的理論，嚴格批評，常極極端。嗣後於一八九〇年及一八九四年所作兩封札上說：「我們的德意志經濟觀點，太過重視，這種觀點，不應承認係受本人及馬克斯的影響。但要知道：當時我們反對「敵人計劃，不說我們的理論中，將他們否認的主要理論，故意發揮其效，不說我們沒有時間，沒有篇幅，也沒有機會，不能對其他的理論，作應有的詳細檢討。我們說經濟情況，是唯一的理由，試問：唯一的活動力，其他一切，都是結果，這句話，並不完全正確。我們並敢說的，法律的，宗教的，哲學的，文學的，這些，完全以經濟進化為基礎，這句話，也不完全正確。要知道以上列舉的各種現象，既有其相互間之影響。復對於經濟進化，發生影響，這些各種現象用互影響的一個例，而以一種必然性為基礎，最後，這種必然性，使自動地完成」。

上段文字之結語，使我人得由是而透澈馬克斯的思想。如果事情從雙方而評論馬克斯的唯物史觀，這種做法，未免錯誤。比較公允的辦法，則是認馬克斯的唯物史觀，為一種定命的唯理主義與機械主義。馬克斯並不否認人的意志，可以影響經濟的下層建築，但他認定這種意志，本身是先天注定的。他並不以社會主義的完成，為直接實現社會進化中的經濟進化原理，但深信只要徹底了解經濟進化的一切法則，就可以確定未來情形。我們從這裏看出馬克斯的確是黑格爾的徒弟。馬克斯欲以物質的因素，解釋過去的歷史，但同時他又想使人類歷史，是一種意識的實現，這個意識是經理性認可的。他承認歷史進化的經濟因素，應該構成一種理論的上層建築，可以創造一個新社會的實際，但同時他又肯定地說，經濟因素，必然產生這個上層建築。他想像整個社會進化，是辯證法的演進，按辯證法的途徑，發覺

處於極端，同時他想像這個演進，與作辯證工具的理性，却是受着同樣規律的支配。

所以，要批評馬克斯主義，必須批評其基本要點：一、試問各種經濟類型，是否必然形成若干理論類型？二、馬克斯肯定地說，社會進化的動向，變化人類意志的動向，這種演變，是在適應環境方面，一個無可避免的演進，試問馬克斯，是否合理的？

我們對馬克斯的這個觀念，要提出下列幾個反詰：

一、這個觀念，為社會主義理論家所不取。蓋因社會主義的學說，不僅是勞動階級利益有了覺悟以後的產物，而是促成勞動階級發生覺悟的先決條件。要知道社會主義的學說，在勞工運動以前，早已存在，而且是發生於勞動界成階級以前。按社會主義的學說，馬克斯和恩格斯的學說在內，其所提出之淵源，可脫無階級的利益，毫無關係。這些學說，不是無階級階級枯澀的智識所產生，而是產生於智識份子豐富的文化。創造這些學說的智識份子，都是屬於小資產階級和貴族。試就創造社會主義理論的先鋒隊裏，加以辨別，我們知道那些大思想家，幾無一人屬於無產階級。日後，等到這些學說，經人列為民衆運動的政綱以後，纔發現若干無產階級的理論家，不過是時候，已不是創造學說，而是闡揚和宣傳原有的學說。再從那些學生致力於理論及宣傳學說之人而看，其中原為工人者，實居少數，大多數從事真正理論工作之人，仍屬於資產階級。試查看現時社會主義刊物所採作家的名單，在許多雜誌擔任撰述之作家中，大學教授及智識份子，占十之九，可知即在一般人努力修正與宣傳各種學說的時代，凡是研究理論的專家，大多數屬於智識階級，這種事實，無可諱言，故雖因時勢所趨，社會主義，已普遍成為勞工運動之目的與政綱，然試考其起源，可說這種學說，不是無產階級本身的產物，而是為了無產階級的利益而形成的。社會主義，不是無產階級為適應其階級環境所見所產生的結果，反之，社會主義之產生，是因若干資產階級或貴族的智識份子，不適應其固有的階級環境之故。

二、再從歷史上說，那些富有「組合同情」及社會主義思想的職業界，亦非覺悟勞動界利益的團體。如果承認這問題，僅是一種意識問題，那末，機器的工人，理應首先解決這個問題，因為在機器工業界，勞動繁雜，比較集中，其工資條件，亦復相同，而且大家沒有職業上的成見和猜忌，照

理講，他們解決這同情問題，比較小工場的手工業者必定來得容易，但是我們知道，創立勞工同情的成規與關係者，不是工廠內的工人，而是師傅匠。雕刻匠，小木匠，泥水匠，手藝工人，幫工裁縫，及修補工人等，簡言之，是這些小工業界的半手工製造工人。請到這些工人的地位，他們不是完全的無產階級，他們的同業組合，始終存在着許多的成見和界限，同時，他們是離羣索居，散處於無數的小工場裏的。他們還在這樣的環境中生活，但是首先提倡勞工同情的人就是他們。我們又可從這裏看出，就歷史觀點而言，社會主義與「勞工同情」，並不是無產階級為適應其階級環境所見所產生的結果，而是一部份的優秀份子，為維護崇高的理想起見，不願適應其固有的階級環境之故而產生的。

三、現在的情形，是否與從前情形大不相同？社會主義雖是少數智識份子和優秀工人，為維護一種理想起見而產生的，到了現在，是否自甘墮落為民衆運動的工具，專供勞力者追求物質利益的掩護呢？馬克斯主義者以為如此。因馬克斯主義以階級鬥爭為純粹的經濟現象，祇要勞動者澈底覺悟在本人與雇主之間存在着利害衝突，這個現象，和個人利益觀念，一般的經濟學者，無不承認其屬於資產階級，或屬於馬克斯主義，大都對這一個概念，有意識的辨別。我們試從心理上研究，我們，發覺有時候，因能自己對於他人某種行動的真正原因，茫然無知，為掩護自己的愚昧起見，我們常說他人公而私。在比較簡單的情形中，例如雇主與工人之間，為了工資上的爭執，發生利害衝突，他們雙方，對於利益，決不會有不相同的或相反的概念，因為雇主方面，知道自己雖然希望少付工資，但這種私心，究應加以抑制，否則，他的態度，將使他喪失良好工人，或引起工人，不滿而釀成罷工風潮，或將使工人怠工，而減少正常的生產量。根據這理由，雇主對於工人每天的工作時間，是否要極度延長呢？抑其本身利益在於不過度延長？這個問題，亦不能憑他本人的主觀解決。他應延長工作時間，但對於可能發生的影響，不得不先加考慮。這些影響固然與工人的生產量有關，但亦為生理的羸弱所確定，故雇主對於生理條件的考慮，決不能全憑個人任其經濟方面打算。考慮的結果，隨各人的見解而不同，於是發現種種相反的態度。有兩位美國工廠的大雇主，為福爾特(Ford)和亞利(Ally)，就因為他們考慮的觀點不同，彼此代表兩種完全相反的態度，福爾特主張提高工資，亞利則主張

### 剝削勞工。

此外，尚有一更嚴重的問題，需要解決。遇工資上的爭執發生變方的利害衝突時，凡其在勞工運動初期時，僑利與僑利價值觀念，雙方有人提議之時，大多數僑主的態度，是否單單可以以僑利利益，即「僑利心」一點，加以說明？我們所見到的事實，恰相反。資方拒絕勞方要求之真正原因，主要的在資方的自尊心與控制權，受到威脅，為顧全計，不得不表示強硬，至於經濟利益，資方認為次要的問題。在若干情形之下，如果專從金錢利益計算，廠主專顧立即改善工資待遇，固不必竭盡全力，對勞工表示反抗也。但一般的廠主，都堅持「自家事情不關人管」的念頭，既不肯自承以前經營的過失，復對於勞方，常有社會階級的反感，簡言之，他們的判斷，都是偏於情感方面的。

至於勞方的利益，我們亦很容易了解：勞働者所採取的態度，往往為「獲利心」所左右，但決定這種態度的因素，頗為複雜，大都由於勞働者對某種事物的判斷，發生反感而來。如果利益僅是數學上的問題，那末，不參加同業組合的工人，一方面享受社會組織的權利，他方面毫不分出其義務，以及控制權的工人，則廠主，反對新工，這些人，可說是祇顧自己的利益了。此外，尚有參加組合的工人，因發揮同情的關係，參加罷工，蒙受種種損失，其本人並非不知道現在的犧牲，如果以金錢計算，恐到死也無法取得補償，但仍堅持主張，不願犧牲。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所謂勞工的利益，決不是營私圖利，此中實有一種知覺，與僑商商人高沽貨價的心理，顯然不同，此種知覺，含有道德的因素在內，無法加以分析的。

四、在此種情形之下，我們是否能贊成馬克斯主義者的肯定說法，而肯定在階級鬥爭中，勞工的態度，僅是勞働者為適應其階級環境起見所產生的結果？茲從工人的實際生活中，舉例證明馬克斯主義者的肯定說法，在事實上適得其反。

馬克斯在資本論一章裏，解釋勞働者所有的同情心理和團結意識，都是大資本企業分工合作原則的反映。他似乎相信，有許多事情，得以未經說明之心理方法，使處於這些事情氣氛中之人，受到薰染。這點，純是唯物論的機械主義，要證明這點，祇須指明在資本主義工廠企業裏，只有技術如機械方面，是合作的。至於人和人的方面，反是注重權力的和分級的。如果追溯勞工者同情心理的具體的與特殊的因，那末，我人容易看出，這

種心理，並非從勞工的技術組織而來，反之，可說是從勞資雙方對價而來的，換句話說，勞工階級的同情精神，正因企業組織不能合作而產生。所以勞工者所有對工廠經驗的反感，並不是必然地在心理的適應情形中，表現出來。他們受到環境的影響，而發生反感；其中一部份的表現，是適應環境的，其另一部份的表現，是對環境反動的。

住宅對工人心理的影響，發生同樣情形。馬克斯主義的理論家，常言大都會中，無產階級的居住，通濶無比，因此之故，大都會即即形成民衆方面無產階級心理的主要因素。大都會的居住情形，無疑地易以傳播一種民衆心理，但這是從一種觀察所及的心理，並不能拿這種情形來，絕對說：住宅繁居，可以形成一種社會主義的心理，關於此點，有一種事實，發人深思，即是社會主義常流行於工業區域之一事實，在工業區域內，住宅素不集中，至少不相接近，比之大都會，相去甚遠，還有一層，所謂社會主義心理，在實質方面，究竟如何，不得不加以檢討。根據一個舉世經驗的事實，大都會的勞工社會主義，與外省小城市居民的社會主義，有不少差別之點，大都會的社會主義，所有對社會及反社會的動機，均較為激烈。這些動機，在大都會表現出來的，是一般人對資產階級的憤恨，不獨此也，大都會裏，一般人尚表現一種攻擊態度，對一般與已接近的人，不問是政見不同的人，或是同黨同黨的同志，都同樣地視為仇敵。大都會住民反社會的憤恨之養成，其原因甚為複雜，而居住情形，為此種原因之一。因為在大都會裏，大家被迫其鄰而居，不獨不能由此產生睦鄰之情誼，反形成一種多嘴多舌而易於憤怒的個人主義。反造成妒忌心及種種利己的習慣。

歐戰時，士兵被迫聚居一處，他們對於這種環境，發生兩種不同的反感，容易被人發覺。一方面，我們看到他們有明顯的適應性，即是大家日夜共處，養成習慣，習識的需要，便無形中減少，直到現在，這種缺乏習識活動的惡果，還有其影響。他方面，我們又看到他們有另一種的反應，形成一種反社會的情感的典型。因為許多士兵，對於永遠家居一處，認為是精神上的桎梏，感覺痛苦。如果不了職時士兵對於共同生活所發生的反感，我們便無法了解戰後志願的個人主義。

是故社會心理學，不獨應研究人類適應環境的反感，且應同時研究人類對於環境的反動，這種反動，可說是環境造成人類所追求的目標。就人類適應環境之感而言，最作爲典型者，即是羣衆能造成種種的共同生活習慣。

# 中國鄉治制度的發展

歷代地方政制檢討之三

陳柏心

## (一) 鄉治制度的分析

歷代的鄉治制度，最為完備，但所謂一書的區區，既成了問題，我們與其說書內的記載是完全確實的制度，不如把它看作古人對於鄉治制度一種完善的理想。關於鄉治制度的發展，當以秦代以後的材料，較為正確。秦漢兩代，縣以下的組織，均為里、亭、鄉、十里一亭，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三老家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循禁盜賊。漢代的鄉官，頗能表現優良的成績，三老的地位很高，皇帝時有賜帛的事實，嗇夫也常使地方做些實際的工作，與地方人民發生密切的關係，例如委廷為外黃嗇夫，「仁化大行，民但聞嗇夫，不知縣縣。」朱邑由潯鄉嗇夫，官至大司農，當他病重將死的時候，對他的兒子說：「我故為制冠吏，其民愛我，必舉我稱鄉。」漢代的鄉官，除了聽訟，收租，循禁盜賊以外，還很注重於地方的教化，但漢代以後的情形就不同了。魏晉南北朝長江流亂，鄉治精神已不存在。隋初採行保，閭，族制，文帝開皇九年，改定百家為里，設長一人，五百家為鄉，設正一人，處理本鄉訴訟爭訟。開皇九年，置福州縣鄉官一人，可以想見當時鄉官制度流弊的深重。唐代以百戶為里，里置里正，五里為鄉，鄉置耆老，里內並有坊與村的編制，設坊正村長，主持警察的任務，唐代鄉制繁興，鄉官主持徭役的徵調，正當出身者不甘自願下流，其人選的完備，不難想見。宋初鄉制沿唐之舊，惟將耆老及保安兩事分別處理，以里正，戶長，鄉書手專司賦賦，以耆老，弓手，壯丁專司防盜，此時鄉官的主要任務，徒供官府差役，鄉治精神實已無復存下。王安石變法，推行保甲制度

，以十家為保，五十家為大保，十大保為都保，設保長，大保長，及正副都保正等分別主持，保甲的特徵，在按戶抽選壯丁，與以弓弩，授以武術，使其輪流備役，是對於當時鄉兵制度的一種改革，即以民兵訓練代替募兵，而用以備地方的守衛。宋自中叶以後，地方上另有一種新的組織出現，當代的學者，鑒於鄉政的衰微，乃以地方領袖的地位，從事於社會事業的興辦，如義莊，社倉，保甲，書院，鄉約等事業，程明道，范仲淹，張栻，呂大鈞，朱熹等人，均曾於這方面為地方事業開闢一條新的途徑。這種事業影響於元代的制度，元代採取其精神，就鄉治制度分為兩種組織，即一為里正鄉約，仍掌管催徵差役等事項；一為以五十家設一社，擇年高通曉農事者為社長，從事於勸課農桑，轉移風俗等各項事業。就宋代諸儒化導社會培育地方的一種社會運動，制為法令，便成為條理精密的制度，這是元代鄉治制度的一種特色。明代的里甲制度，完全是一種供應賦役的組織，以一百十戶為里，推丁多者十人為里長，餘百戶為十甲，甲首十人董其事，依次輪流應役，流弊不可勝言，此外仿元代立社遺意，有里社，社學，社倉，鄉約等辦法的實施。清代鄉治組織迭經變遷，初行編甲制，係一種強衛安民的制度，後行里甲制，係重在賦役的催征，其後復會推行保甲制，辦理課役保安等事業，最後實施保甲制，則著重於地方的警衛，牌頭甲頭保長等人員，地方官不得派別差，以專責成，至社學鄉約，社倉等制度，亦會明令推行，清末推行近代式的地方自治，於是鄉治制度的發展進入一新的階段。我們分析歷代的鄉治制度，大體上可以將鄉治組織區別為下列三類：

一、國家行政的基層機構：這是最基本的鄉治組織，秦漢的里，

卒，焉，隋的保，周，漢，唐的保，等，則的保，甲，清，的保甲，里甲，里社，保甲等。這都是以家或戶為單位，依一定的數字與方式，精細編組，使成爲一有系統的組織。這種組織的主要任務，乃在助官與治官之所不逮，辦理收稅，徵，課，保甲等事務，諸如租稅的登記，催繳，收放，辦，辦的調查和傳訊，民間爭議的排解，懲戒的糾捕等等，均由此種組織辦理，這些事務，都是國家的直接行政，這種保甲，雖然由地方人士担任，但其身，實質爲國家的下級行政官吏，係國家行政實際執行的人員。其次依戶數編組，同時亦在使各戶之間，互相糾察檢舉，俾得揭奸弊盜，安定地方，如管仲，所齊的什伍之制，使「伍無非其人，人無非其里，里無非其家，」然後奔逃，定者無所隱，隱者無所容。這種制度進一步的適用，即爲縣保連坐制度的，如商鞅選用這種什伍之法，使之相儻等，互相糾察檢舉，一有犯罪，則九家連坐，若不舉發，則十家連坐。宋代保甲組織內對同保犯盜，殺人，放火，強姦，搶人，傳習妖教，造者蠱毒，知而不告，依律伍保法，餘，事于己，以及居留竊盜三人，經三日，保鄰雖不知情，科失覺罪。清代保甲，組織內，亦有無辜連累稽查，有事互相救護，月底令保長出具無事甘結，報，官備查，違者罪之的規定。這是利用這種組織，使彼此詰察，以防止容隱奸，而維持地方秩序的完。

二、地方自衛組織：宋代王安石所提倡的保甲制度，除了利用保甲組織，使各戶互相糾察檢舉連坐外，其特殊之點，在於實現寓兵於農的辦法，其目的在改革鄉兵的制度，蓋當時的鄉兵，出之於募集招致，兵額過多，將士，士情，統制不易，而使耗國用，因此編組保甲，按戶抽丁，施以教練，使成，爲保衛地方的力量，蓋師古代兵民合一之制，藉以補地方的武裝而用以自衛，這是和一般鄉治組織性質不同的地方。這種地方武裝自衛的制，在宋代，雖不久即廢，但以後各代，類此的地方軍事組織，如地方上的民團等等，不，少出現於中國社會。

三、地方公益的組織：國家行政的基層機構，在以收稅徵丁，課役保甲等事務為主，地方公益組織，則在處理勸業教化等各項地方公益事務，即有，關地方人民本身利益的事務，前者在消極的爲國家供策，後者在積極的爲

民籌謀福利，兩種組織，在事實上未必有絕然的劃分，漢代的縣官，兼顧政，政的事務，後世的鄉官，亦有使之處理勸業與教化一類事務者，但在鄉治組織內，亦有純粹處理教養事務的組織，其性質雖然，與專以收稅徵丁課役保甲等任務的機構不同，如元的社制，宋明清各代的義社，義會，社倉，社學，鄉約等等，或爲私人所倡導，或爲政府所推行，要皆爲籌畫扶助的組織。除，宋代各種社會事業，純爲地方人民的自動組織外，元明清的社制，以及社會，鄉約等制度，均在政府提倡指導下由人民起而組織，是一種半官半民性質的，團體。

### (二) 鄉治制度的性質

我們研究鄉治制度的組織，首先探討歷代鄉治制度所存在的理由，也，就是這種鄉治制度的發生與發展，究係基於何種原因，我們可從幾方面來，說明這個問題：

一、我國歷代都以縣爲最下級行政區域，通常稱縣長爲民之官，但一，縣面積，仍然非常廣大，人口仍然異常繁多，在交通梗塞的情況下，行政力，是還是不易處處都能達到，政府與人民之間，還是有着很遠的距離，古代，行政事務雖然簡單，但賦稅與徭役的徵收，是統治階級維持政權的基本，必，須爲有效的執行，而這些事情，又必須熟悉鄉情的人，才能辦得完密，於是，不能不有這種鄉治組織，來宣達官廳的意志，推行政府的政令，以補助官，廳的不逮。

二、我國是一個農業社會，各地村落疏散，治安不易維持，因爲政府無，法在廣大面積內，設置足夠維持治安的警察，於是不得不從嚴密民衆組織上，着手，運用這種組織，使人民相保，相守，相察，相督，以維持地方的安寧，亦所以防止匪禍與叛亂等事件的發生。我們觀察若主的統治國家，對官廳，用以官制官的辦法，對人民則用以民制民的辦法，其結果就使得無論官廳，民衆，都能聽受最高統治者的驅策，而後國家可以保持安定的狀態，國家，能保持安定，不僅有利於君主政權的維持，亦爲官廳與民衆所希望其實現，，在此君主官廳民衆的共同需要下，這種制度就有了永久存在的條件。

三、地方人民互相監察的辦法，其收效有其一定的限度的，被大規模的變亂，非這種監察的機構所能應付，因此地方上非經常維持相當的武裝力量，不足以勝任其不變亂的責任。但國家要經常在各地方配備相當的軍隊，不特國家財政難以負擔，同時這種軍隊本身，亦往往為國家禍亂的根源。王安石深知知兵兵的無效無用，於是想出地方人民自衛武裝的辦法，就地地方壯丁加以編練，使其統屬於政府，隨時應付各種的變亂。至在人民方面，從遇到軍閥的混亂，土匪的騷擾，身家財產毫無保障，而這種保障，既不能從政府方面取得，於是不能不依賴自身的努力，因此地方自衛組織，既由政府提倡和人民需要，而得有發展的機會。

四、中國古代的治政，採取消極無為的原則，政府的主要任務，在於收租稅與懲治罪犯，這種工作最容易擾亂人民，所以任何政府或官吏，只要顧到政簡刑清，就是好政府好官吏，人民最怕的是政不簡刑不清，好政府所最要警惕的也是政不簡刑不清，在這種情形之下，政府本身當然不會替人民對有積極性的救災工作，人民的許多福利事業無人過問，偏偏政治上官吏貪污，習為常事，破亂的社會，事實上很迫切需要做一些化導培育的工夫，惟政府既不開，祇有地方自己來做，這是宋代地方公益事業發生的原因，這種以本地人替本地地方辦事組織，固足以增進人民的福利，但亦不遑反政府與利益，於是宋以後的元明清各代，差不多都提倡這種事業，因此地方人民自己經營的公益組織得能相當的發展。

我們明瞭歷代治政組織發生的原因，可以進一步研討這些組織的性質，許多人認為這種組織就是中國的地方自治制度，我們首先要研究這種制度，究竟是否為一層自治制度呢？

如果我們現在推行的地方自治制度比較，則無論在形式或精神上，均屬根本異趣，這點我們可以從幾方面來說明：

一、中國歷代的鄉治制度，大抵以家或戶為基本的組成分子，係從家族觀念的基礎上產生和發達，即以鄰近的各家或各戶加以編組，就原來的宗族，使成爲一羣齊嚴密的組織體，這是一種農業社會的產物，僅爲一族或一個小區域內的人民利害着想，因此常因狹隘的保守性和偏狹的排拒性，中國社會內那族間械鬥及衝突風氣的盛行，可知宗族觀念對人民生活有很大的支配力量。從西洋移殖過來的近代地方自治制度，則以地域爲其構成的要素，是一個固定地域內的綜合的政治組織，所謂地方自治，指國家以內政治組織的

一種體制，係在國家意識之下成立，由於工商業發達的結果，其性質爲國家的一種政治的或行政的區劃。簡言之，古代的鄉治制度，係以宗族爲組織的基本，而現代的鄉自治制度，則以固定地域內的人民爲組織的對象，蓋農業社會的人民聚族而居，以家庭爲基本組織，集合許多同一血統的家庭成爲宗族，經成各個的村落，鄉治制度就是利用這種宗族關係而產生的組織，工商業發達以後，人民相互間的經濟聯繫，已不復以宗族爲生活的單位，故以地域爲組織的要素。當然這種區劃並不是絕對的，利用宗族觀念產生的組織，亦須以某一區域爲範圍，以地域爲要素的組織，亦可包括宗族的結合，但兩種制度則着眼點不同，所以仍然表現出不同的特徵。

二、中國的鄉治制度，或在輔助官廳命令的不違，或則辦理地方公益的事業，其存立的目的，絕無干預治權的意味，其處理國家行政，因爲法令所規定，至辦理公益事業，亦係本於自救與自守的義務心。現代的鄉自治制度，則爲人民參政的一種方式，實行自治的地方，該區域內的人民自行組織團體，以處理自治事務，這種事務，亦即團體存立目的之所寄，地方自治團體得以獨立自營有關本身的事務，自成爲一統治的主體，此鄉自治制度的純以輔佐政府爲目的者不同。

三、歷代的鄉治制度，既係一種利用宗族關係的組織，因此以宗族的情感爲支持組織的根本，以重秩序守信義的道德精神爲維繫組織的條件，因此其組織僅能行於德義實行的可能範圍，限於近鄰的結合，而不能爲大規模的發展。現代的自治制度則係就整個國家的領土，予以有計劃的劃分，地方自治的權限和活動，均根據法律的規定，亦即以法律爲維持組織的基本。鄉治制度僅行於一個宗族或一處狹小的地域以內，而地方自治制度則可行於國家以內各級地方的區域，國家以法令規定其行動的準則，僅須服從國家的監督，不受地方區域狹窄的限制。

鄉自治制度與近代地方自治制度的不同，是無須爭辯的事實，不過地方自治的意義，如從廣義的解釋，則凡是由本地人自己辦本地地方公務，就算合乎自治的原則，英國人認地方的名譽職吏員，以地方稅處理地方行政，就是地方自治，我們過去的鄉官，亦可說是本地人辦本地事，同時亦不支國家的薪給，其經費由各戶樂捐或公攤，並不由國庫支出，似乎不能不算是一種自治制度。但是我們就歷代全部鄉治制度來考，其中如各種地方上的公益組織，確係出自人民本身的需要，辦理地方人民有關的事業，不能不認爲合乎地方

自治的精神，假定中國古代有地方自治制度的話，這一類的組織，我們不妨看做是一種自治的組織。但歷代鄉治制度中最主要的一種國家行政基層組織的產生，與其說是出於人民的自願，不如說是出於政府的逼迫。這些人員，即使沒有一定的薪給，但利用政府的威力所得到的報酬與待遇或遠勝於有薪的薪給，他們絕不是人民自己的領袖，而是國家公佈於地方上的差役，如果僅僅以本地人主持這類事務，而稱之為自治組織，未免過於重形式而忽略精神。至地方自衛組織，當王安石舉保甲的時候，原為一種兵制改革，以後發展為民間一類的組織，成為地方民衆自己的武力，或有相當自治的意義，但這種軍事部勒的組織，也很難認之為真正地方自治的組織。

### (三) 鄉治制度的影響

研究地方制度者，大抵僅注意各級行政組織的變遷與發展，而不注意地方上鄉治組織對於全國政治與人民生活的影響。實際上地方自治的公益的組織，並未能有極普遍的發展，因為地方上未必有真正能替人民辦事的人，即有亦不能常得適當的接替者，這些組織的維持沒有完密的制度，辦事沒有一定的程序，也缺乏適當的監督，因之往往為少數人所操縱把持，借公濟私，即有真正熱心者主持，也僅能到入有政舉，人亡政息的地步，事業本身便不易永久的維持下去。祇有國家行政基層組織這一個組織，出自國家的需要，絕對不容中斷的，故在政治上發生重大作用，而與人民生活亦息息相關。何以在國家政治上發生重大作用？中國政治上的行政實權，操之於掌筆書案的文書人員，普通稱為書吏或胥吏。這種胥吏，往往自成系統，其職務可以世襲，可以出首，流弊百出，不能禁止，而在州縣的胥吏更為更烈。胥吏不習政事，科甲出身者僅長於八股詩文，至捐納出身者，更不知政務為何事，於是不得不假手於這些胥吏，案例獨裁，不易稽查，又不能不任胥吏的上下其手，貪污為奸，惟其地位低微，但把持操縱的力量則甚大。至於另一方面看，政治上的行政層級雖多，但自中央以迄郡縣，向來僅是承轉機關，認真者加上按語，敷衍者則直抄通轉，其中以縣為直接親民行政的一級，縣長雖為親民之官，但事實上縣政係由胥吏在負責執行，而胥吏的執行，仍不能不假手於這種鄉治的機構。所有徵稅徵工一切事務，均自上而下，層層壓轉，到這種鄉治機構實行，主持鄉治機構的場官，實際是等於縣政

府駐外的官吏，向是行政實權的真正掌握者。國家沒有這種鄉治機構，一切行政恐怕都辦不通。隋文帝時一度廢止鄉治制度，但其後各代均一律維持，從此可以看出國家不能不有這種機構，而這種機構確實在政治上發揮很大的潛伏的力量。

何以與人民生活息息相關？這種鄉治機構，既為政府所不可缺少的組織，政府為欲推行一切政務，又不得不授以相當的權力，如果鄉官由不諳正業者充任，地方自可安居樂業，但如果把持在不肖的豪紳地主以及流氓地痞手中，勢將擅作威福，流弊百出，閭閻騷擾，無有寧日，在這種情形下，人民生活受到很大威脅了。

關於鄉治機構的流弊，並非政府不能明瞭，一任其自由發展。周禮一書內的鄉治制度，固為歷代政治家所嚮慕以求的理想，漢代鄉官的治績，亦為一般從政者所欽羨。但漢以下的鄉治機構，何以不能健全發展，歸納其原因不出數端：一、歷代的地方吏治，不易達到清明，就是能够有一個清明的時期，也不能維持很久，地方吏治汚濁，這些鄉治人員為因緣為如，無所畏忌，猶如千真虎狼橫行鄉間，沒有任何力量可以遏制。二、鄉治機構的積習已深，而為數又何止千萬，地方吏治的整頓，不能達到底層，於是積習而成的惡劣風尚，沒有澈底糾正的機會。三、最主要的經濟制度沒有改變的，豪紳地主的勢力，沒有方法可以推倒，在這種社會組織裏面，要避社會運動的，於是政府不得不充分利用這種勢力，以為鞏固統治的手段。四、鄉治機構的主要任務在征稅抽丁，潔身自好，心地清白者大抵，層層這類事務，因此比較公正的士紳不顯出來主持，於是只好讓土豪劣紳把持了。

這種鄉治制度當政府賦輕役薄，而吏治又比較澄清的時候，監督比較嚴密，其流弊自可相當減少，但當國家需要徵發與任務增加，而吏治又極腐敗的時候，官紳勾結，任意剝削，人民受壓迫愈深，對統治階級的反抗力量遂漸滋長，於是舊政權就隱伏着傾覆的危機了。同時我們更可以看出中國政治上不能辦新政，因為辦新政，又不能不重成遺留機構去推行，這些機構，惟恐無事辦，凡有舉必將小事化大事，不啻為貪污開方便之門，盡利民的行政，到了這些人員手裏，就成為病民的苛政了，司馬光蘇東坡他們當時反對王安石變法，在他們心目中就認定新政府的實施，徒然騷擾人民，所以還是主張保守成規，這又是中國政治上清極無為的作風，所以始終不能改變的又一原因。

# 戰後經濟建設問題

蔣君章

## (一) 戰後經濟建設的最高原則

中國在這次抗戰中，因為戰前的經濟建設沒有完成，倉忙應戰，遂致物資方面遭遇到很多艱苦的問題。幸而我們抱定了抗戰和建國一舉其功於一役的國策，一面努力抗戰，一面注意建設，因此軍需民用，均可勉強維持，其功甚偉，其困難自亦非比尋常。現在勝利在望，抗戰大業，行將告竣，而此後建國工作，則尚有許多事等着我們去做。換言之，我國在抗戰期中已經獲得四強之一的地位，但是要使我們的國家趨於現代化，而我們的國力真正列於四強之一而無遜色，那麼我們應該努力的方向還多得很，而經濟建設要算是最重要的部門了。

戰後我們的經濟建設，應當怎樣進行呢？這個問題，時賢頗多討論，有的主張重農，有的主張重工，有的主張農工並重，有的主張全國各區的經濟均須發展，高瞻遠矚，名實兼顧，誠使我們佩服。作者感到無論農也好，工也好，東北也好，西南也好，此後在中華民國的建國大道上，都要盡量發揮它的作用，只是先後緩急，不能不有所輕重了，而這種先後輕重或緩急之分，應該另外有幾個標準，在這幾個標準，沒有定下來之前，我們就應建設問題，是應從下手的。因此在我們討論建設問題之前，先把它戰後經濟建設應採的原則說一下。

我們的戰後經濟建設，應以充實國防為第一目標。一般人以為亞細亞一環的魔王是日寇的軍閥，戰後日寇軍閥倒，武裝解除，回到它島國的原來地位，中國一時無被侵略之虞，國防力的充實，似非最為急要；在另一方面，自抗戰軍興，精華區域被破壞，社會凋敝，民生凋零，因此經濟上急須振興，應當以民主主義為對策而首先加以建設。這種觀念，也有一部分理由，而實際上則不然。我們知道中國國防經濟，本來是很落伍的，加

上這次抗戰的殘破，我們的經濟，尤其在生產方面，比起戰前，有着千部百有顯著的進步，而大多數是在減退中。反觀國外，在這次戰爭中，生產上有着飛躍的進步，新的技術，新的分工，新的管理，都對於生產有極大的貢獻。我們若不迎頭趕上，勢將愈去愈遠，永遠在人家後面還有限不上之苦，何況國際風雲變幻莫測，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各國雖以永久和平與裁減軍備為言，但是二十年後又發生規模更大的殘酷更甚的二次大戰，其和平期間比歷史上的任何時期為短；我們固雖然極希望這次大戰以後，我能夠利用過去的經驗和新的智慧，使世界和平可以永久維持下去，但是孟子所說「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的至理，我們應當牢記於心，並且應當未雨綢繆，事先有所準備。故自第一次大戰以後，舉世滔滔，哲言和平，而國際間致力於國防經濟的建設，國家以大量農產向國外易取機器，以從事於重工業建設，雖國民不能不飽，亦所不辭，等到重工業方面有相當成就以後，民生工業，也隨之發達。故我國戰後的經濟建設，實應以國防為第一要義。

國防第一要義的經濟建設，應當竭力避去戰前經濟建設的缺憾，盡量利用戰時建設的經驗，從這兩方面所得的結論，作為我們戰後經濟建設的重點所在，茲分別討論之。

## (二) 戰前工業建設的缺憾

我國在抗戰以前的經濟建設，多感人是私人自由營利，而以商業為中心的。因為要營利，所以工業的方向是以市場為需要，資金流動最活潑的專業為目標，因此，大家集中在輕工業方面，大家把工廠開設在交通便利的通都大邑，而且大家集中在少數的國產目標。因此若干地方和若干種輕工業，特別繁榮。統計數字告訴我們戰前全國各工廠的工廠三千九百三十五家，但上海之工廠已有一千二百三十五家，使全國工廠百分之三十一點，浙江工廠七百八十一家，佔總數百分之二十，江蘇三百八十八家，佔總數百分之八，此外湖北二百零六家，山東二百二十八家，綏遠一百七十家，寶島一百零

十八家，廣東一百家，此外分布於南東與北中等地者，亦在一百家以上，而  
心，而上海與沿海及沿江下游各省，幾佔中國工業之全部。故就工廠之分布  
言，偏頗不均之弊甚大。再就工廠種類言，亦有同樣的現象，上述三千九百  
三十五家工廠中，食品工業九百二十家，佔百分之二十三以上，紡織業八百  
八十三家，佔百分之二十二，化學工業五百三十四家，佔百分之十四，礦  
業一百三十九家，佔百分之九，其中能運機器者為數更少，金屬工業  
僅一百三十九家，冶煉工業則僅六十家。此種情形，所發生之流弊，舉其  
大者，有如下列諸端：

第一、沿海交通便利的部居大邑，在國際競爭中，最易遭受敵人  
的襲擊，心身最易被敵所破壞，那就是說最不安妥的。

第二、若干種實業發生過份的競爭，形成資力的浪費。

第三、基本工業或本重利輕，或資金收則不易的實業，很少有人主顧問  
道愛種流弊，在這大戰中完全暴露出來，而我們抗戰中所遭遇到的  
許多困難，也便是這種流弊之所賜。

再自戰前的交通方面來考察，也正犯了同樣的毛病。以交通上最重要  
的鐵路而論，我國戰前的鐵路有兩個特點：其一就是建築的方向大多數是  
由海口向內地發展，如京滬、滬杭、滬甯、北平等重慶鐵路，無不如此，即  
後來建築的浙贛鐵路，也還說不了這個特點；其二，是分布在沿海或近海的  
區域，如膠濟路與浙贛路之盡力向內地發展，實為少數例外，也是築路後  
明的事了。這種路線的分布，也自有其經濟上的利害，很顯然的，沿海和沿  
江區域，是我們人口最稠密且經濟發達的區域，那些區域，對於近代交  
通的需要，自然也特別迫切，而在這種地帶建設鐵路，運費的收入，自然比  
較的多，但也有其顯著的缺點，就是開外的製造品，便利用此等便利的交  
通路線升入我們內地，破壞我們的農村經濟。此種情形，延期稍久，即農產  
亦受影響，如民國二十二年之穀賤傷農，便是一例。而在國際戰爭發生  
時，此種路線所發生之流弊尤大，因為敵人利用它的優勢的航空軍，佔領我  
們的海口，更沿著鐵路向我進攻，結果我們的鐵路是大多數被敵利用了。  
此外，戰前的金礦勢力，也集中於少數大城市，而尤以上海為中心，集  
中在上海的游資，集中其力資於投金的買賣和房地產的投資，這種勢也是畸  
形的發展。抗戰中金礦中心的轉移，尚未及工業中心與交通中心轉移之困難

### (三) 抗戰中經濟建設的經驗

，但因這是不合理情勢的存在而發生的困難，也是不少。

抗戰軍興以後，我們的經濟重心，由東南移向西南，於是西南各省發了  
我們建國的興隆地。這一個區域，大部份地方是比較落伍的，交通既不便  
設備又其簡陋，但我們在這落伍簡陋的區域，開闢了許多的工廠，或就軍  
有自生產而增加以補充，因此不能生產的區域，產量不增，或就軍  
因而收獲到軍民需要均能勉強維持的程度，這是我們戰時經濟建設的大成  
最多，佔百分之四十四，其次為湖南，佔百分之十三稍多，其次則為陝西，  
亦佔百分之十以上，他如廣西約佔百分之八，甘肅約佔百分之三又七，貴州  
雲南約佔百分之三，而一向或為偏遠的西藏、青海、寧夏等省，也都相繼  
立了工廠，而其分布已一變過去之積弊。就工業資本之使用而論，以四川佔  
百分之五十八為最多，以雲南佔百分之十又八為第二，又次則為廣西、陝西、  
浙江、甘肅等省，至動力之使用，亦以四川為最多，佔百分之四、三，次  
為湖南，又次陝西、雲南、廣西等省。故後各省之工業，已相時的現代化，  
而四川則為我後方工業之中心。

戰時後方工業所遭到的困難是很多的，如原料問題、工業問題、技術問  
題、技工問題、資金問題等，差不多每個工廠都碰到的，這些問題有的  
是戰時所特有，戰後可以不成問題，如若干工廠所需之原料或機件，戰時難  
以方法費盡心力，也許還不容易解決，但在戰後交通恢復，則此等問題，便  
可迎刃而解，毫無所謂困難；又如資金問題，戰時因為物價波動甚烈，  
常常影響成本，妨礙生產，因即使產量不多，而資金仍有凍結之虞，此亦  
為戰時所特有，戰後物價穩定，各方需要量又大，亦可不生問題。有的戰時  
與戰後同樣發生，而同樣可以設法解決的，如技工問題或技術問題，戰時  
方各工廠所需之技術工人，往往從淪陷區設法招來，此種工人戰事結束後  
當有一大部份返歸故鄉，故戰後各工廠之技術工人，仍有問題，但可事先調  
種本廠工人或僱其待遇以延長其服務期間，故此問題亦可解決。但另有  
種問題，戰時可以勉強過去，而戰後必日見其嚴重性浸浸至不易解決者。如  
以四川之紗廠為例，四川現有紗廠，所需之棉花，大多數自陝西和湖北運來

陝西之棉由水陸聯運而來，湖北之棉，由水路運來，四川本地之棉，以織  
機運粗，適於織器之用者甚少，故四川紗廠，戰事結束以後的初期，自然還  
不致受多少影響，不過在下游諸省棉業恢復，當其產量可以充份內銷時，則  
四川紗廠之產品，是否能與競爭？當成問題。這不過是一端，類此的還很多。  
我們覺得此後方爭奪經營所成之少數工業，戰後如何維持它或予以繼續發  
展，是相當成問題，而這項先有解決的準備。  
在抗戰中，我們在經濟建設上另外感到極大的痛苦，就是運輸問題。  
我們後方交通上有兩個大缺點：其一載重差，其二路線過於迂迴，因  
此所費的時間與運費特別多。我們後方載重至要在爲止，只有極少數的鐵路，  
能通輪船的水路也不多，因此多數的運輸，只靠公路汽車，與國外交通，有  
時只靠空運，故比較重大的機件，都無法運輸。又譬如我們要從重慶到老河  
口或西南，公路汽車，都要繞些圈子，如果走直接的路線，便要徒步翻山，  
我們要派人西康和青海等省的腹地，那更非靠畜力不可。這些影響於經濟建  
設的固不小，影響於國防軍事者尤其重大，是我們以後經濟建設不可不注  
意的問題。

#### (四) 戰後經濟建設的重點

由上所述，我們可以知道我們的經濟建設的方向，固然要注意從無到有  
的，必從少數到多，從粗劣到精緻，但在實行的過程中，要注意到安全的  
問題，要注意到計劃的問題，務使以前漫無規劃的發展，變成有計劃有步驟  
的發展。

從這次苦痛的經驗中，使我們感到安全問題實在是最重要的，因此後方  
各行現時已經發展到工業，不但要維持下去，而且還要繼續發展下去，使它  
成爲我們的工業中心。但是這個問題在戰事結束以後是相當重大的。我們知  
道中國資源的分布，各區域有獨特的點，如煤和鐵等重工業的基本資源，則  
在東北與華北；液體燃料的寶藏，在東北與西北；黃金屬資源在西南；纖維  
資源在西北、華北與華中；綠茶桐油等重要外銷物產，在東南與西南。理想  
的經濟建設，應當依各區域的特長，加以發展，用交通路線來調劑各區域的經  
濟關係。但以國防安全爲着眼之點，則此種建設重心之採取，殊有未合，  
而應當在安全區域，普遍地發展國防工業，並應設法發展可儲利用之各種物

資，以從事於工業建設，經驗告訴我們只有西南的川鄂湘桂滇和西北的陝甘  
寧青等省，是我們的的安全區域，這幾個區域可以立於國內任何競爭之下而毫  
不驚慌，是甘肅的毛皮與液體燃料業，陝西的棉織業，四川的絲織業，湖南的絲  
業與錫業，雲南的錫業，廣西的錫業，銅業，各各有其特點，有發展之望。  
其他可以發展之事業很多，但可能立於不敗之地者不多，而且以四川  
爲例，四川的鋼鐵，在我國之地位甚高，但是川鄂湘和閩廣之棉棉競爭，是不  
容易經營的。又如錫業，從前丁文江先生考察過貴州的礦產，丁先江的說  
只是貴州簡直沒有什麼礦產，這句話實在的意是說貴州的礦太寒了，煤  
的儲量不厚，鐵的儲量不厚，都是不合機器開採的標準。在戰時，我們  
要生產，那把它來利用，那算是無可非議的，而戰後的維持與發展的問題，  
固然是顯著的事實。因爲這些是安全區域，是國防工業的基礎地帶。這  
些的工業並不是以盈利爲目的，即使是由國家負擔全部責任，並不是說每  
一樣建設都要由國家來辦，而是由國家負責計劃和督促獎勵的責任，除若  
干必要的工廠業外，其餘有盈餘把握的儘先由當地政府與人民去辦。

我們覺得戰後國家的精力，應當集中於交通建設，而後方各省的鐵路，  
尤其應該注意建設的。經濟建設的發展，是要靠交通來促進的。戰後交通建  
設，應以鐵路爲重心，但過去鐵路建設的錯誤要改正，戰時鐵路缺乏的苦痛  
要補救。歐西各國，面積之大，就稱大國之德法諸國，也不過我們中華省  
之一半，但他們的鐵路，嚴如蛛網，並行鐵路達五六線之多，以我國面積  
之大，現時橫貫全國和縱貫全國的線路，尙付缺如；我們覺得華南、華中、  
華北和滇黔，都應該有一條橫貫線，而這些橫貫線之間，最少應當有四條以  
上的聯絡線，依照這種原則，廣三線應當延長至昆明，而與滇越鐵路相接，  
以直通緬甸，滇緬線應當延長經湘西黔中分別至渝昆，騰越路應延長與  
蘭州分列至蘭化與土魯番，而不縱線，亦當自包頭延至蘭州。蘭州與成都  
路，應爲未來之鐵路中心，而建築直接的鐵貫線，而舊時所計劃了同成鐵路  
，仍有建築之必要。自成都至迪化之路線，以經松潘等地爲最近，目前鐵路  
建設，尙無必要，則以建築公路代之。又青康藏高原上之交通，尙能以獸力  
爲主要，橫貫與橫貫的公路線之建築，也是必要的。

# 實業計畫畫蠡測

古方

## 一 前言

總理實業計畫一書，以促進世界和平，實現民生主義，建設富強康樂之新中華民國為指歸。思慮周詳，規模宏遠，誠建國之寶筏，而國民所必備之常識也。作者雖非專家，爰敢述總理「吾欲操此發展之權，則非有此知識不可，吾國人欲有此知識，則當讀此書，尤當熟讀此書」(實業計畫序)之訓，加以研讀，並於研讀之餘，略抒所見，以就正於讀者，非敢自附於「觸類旁通，舉一反三」(同上引)之義也。

## 二 實業計畫與世界和平

曩者，世界交通尚未大臻發達之時，其困於世者，蓋莫不汲汲然以獨善其國是求，而視他國之繁榮與否，則若秦越人之視肥瘠焉。自科學發明，文明益進，交通工具之高度發達，全球各地，洞若戶庭，於是，各國無論政治、經濟、文化等等，均無不相交相識，相激相盪，錯綜複雜，編為一體，更無一國可以自處於世界共同命運之外。此有識之士，所以有「世界和平，不可分割」之論也。

夫人類之進化，必循互助之原則，然後可以臻於繁榮與和平，而使全人類蒙其福。非然者，則相爭相殺之禍，其將伊於胡底！互助之實現，又莫要於使全體人類，均得各遂其生，各樂其業，而不受貧窮困乏及失業之痛苦。今日羅斯福總統所提倡之「不慮慮之自由」，其精蘊蓋即在此。故此世界和平而實，必先求世界經濟之普遍繁榮，而後世界和平，始得有其堅實之基礎。倘使有一國不能在經濟上獲得自主自立，而常陷於貧困之深淵，則影

響所及，匪惟加重先達諸國之負擔，抑必引起侵略者之野心，而使和平不能可保。

鑒於此點，總理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已早見及此。實業計畫序曰：

歐戰甫完之夕，作者始從事於研究國際共同發展中國實業，而成此六種計畫。蓋欲利用戰時宏大規模之機器及完全組織之人工，以助長中國實業之發達，而成我國民一突飛之進步，且以助各國戰後工人問題之解決……將來各國欲恢復其戰前經濟之原狀，尤非發展中國之富源，以補救各國之窮困不可也。然則，中國富源之發展，已成爲今日世界人類之至大問題，不獨爲中國之利害而已也。

又該書結論云：

世界有三大問題，即國際戰爭，商業戰爭與階級戰爭是也。在此國際共同發展中國實業計畫中，吾敢爲此世界三大問題而貢一實行之解決：即如後述體文而起之哲學家所發明人類進化之主動力，在於互助，不在於戰爭如其他之動物者焉。

竊窺總理著實業計畫之原意，本欲於當時見諸行事，而並非徒託空言。誠使當時實業計畫能得列強之協助與國民之奉行，而完全付諸實施，則第二次世界大戰，或竟可免。何則？此次大戰，肇端於「一九一八」日本之侵略我東北，而日本之致於發動侵略，則所謂「見其可欺而欺之」耳。向使實業計畫，當時即付實施，則當「一九一八」之時，我國已經十餘年之開發經營，其實力必已不可輕侮；而各國在華之利益，亦必益以加厚。日本爲畏我國之堅強抵抗，及顧忌各國之積極反對，或不致輕啓戰端也。今後我國無論爲其

實業計畫第一計畫第一節北方大港有曰：

實業計畫第一計畫第一節北方大港有曰：伯利亞一帶，皆以此為最近之海港。由是言之，其供給分配區域，當較紐約為大。第六究竟，必將成為歐亞路綫之樞紐也。又同計畫第三節西北鐵路系統中曰：以地位適宜之原則言之，則此種鐵路，實為支那世界最重要之位置。蓋將為歐亞鐵路系統之主幹，而中歐兩陸人口之中心，因以聯結。由太平洋沿岸前往歐洲者，以經此路綫為最近。而由伊犁發出之支綫，將與未來之印度歐州鐵路（即行經伯達以達馬斯加斯及海峽府者）聯結成一連綫。將來由吾人所計畫之港（北方大港——作者注），可以直接舒斜角航。經現在鐵路，於世界位置上，無較此重要者矣。

觀以上兩節，可知西北鐵路系統，在歐亞非三洲交通上之重要。其次，第四計畫第一節中央鐵路系統中，有東方大港之說，東方大港庫倫線，東方大港烏里雅蘇台線，北方大港哈爾濱線，均可與國外鐵路相接，而為歐亞交通之重要孔道。

復次，我國面臨太平洋，為太平洋西岸之大國。其在印度洋方面，雖有中南半島及印度之隔阻，但亦可以鐵路與之聯絡，使我國與印度洋聯為一氣，而兼為印度洋之國家。上述由伊犁發出與印度歐州聯絡之綫，即具有此作用。此外，第三計畫第三節歐亞鐵路系統中關於廣州雲南大港鐵路綫

實業計畫第一計畫第一節北方大港有曰：伯利亞一帶，皆以此為最近之海港。由是言之，其供給分配區域，當較紐約為大。第六究竟，必將成為歐亞路綫之樞紐也。又同計畫第三節西北鐵路系統中曰：以地位適宜之原則言之，則此種鐵路，實為支那世界最重要之位置。蓋將為歐亞鐵路系統之主幹，而中歐兩陸人口之中心，因以聯結。由太平洋沿岸前往歐洲者，以經此路綫為最近。而由伊犁發出之支綫，將與未來之印度歐州鐵路（即行經伯達以達馬斯加斯及海峽府者）聯結成一連綫。將來由吾人所計畫之港（北方大港——作者注），可以直接舒斜角航。經現在鐵路，於世界位置上，無較此重要者矣。

云：

此路本綫，自東至西，貫通桂滇兩省，將來在國際上，必見重要。因在此綫綽綽有餘，當與緬甸鐵路系統之仰光八莫一綫相接。將來此綫自印度至中國最捷之路也。以此路故，此兩人口稠密之大邦，必比現在更為接近。今日由海路此兩地交通，須數禮拜者，異時由此新路，則數日而足矣。

觀此可知此綫對於我國與印度洋聯絡上之重要性，而我國將來並可利用印度洋各海口為其西南各省之出海港口矣。

今我國西北兩部，交通梗塞，由內地赴西藏，反不如想道印度之便。是則我國之西陲，竟無殊於甌脫。而使我國與世界，因而陷於割裂狀態。如不亟謀發展交通，其將何以使我國與世界相聯，以共謀世界之和平。僑使上述各鐵路綫以及各直隸及遼行國界各綫，全部完成，則我國與世界，必能息息相通，休戚與共，其有助於世界文化之交流，世界經濟之發展，人類福祉之增進，世界和平之維繫，將為如何？此猶待就建築鐵路一端而言，其他如海港之建築，海運之發展，以及各種工業之振興等等，莫不足以直接間接促進世界之繁榮而永維世界之和平。然則，實業計畫與世界和平關係之密切，不已灼然可見乎？

### 三 實業計畫與民生主義

建國大綱第三節曰：

建設之首要在民生。故對於全國人民之衣食住行四大需要，政府當與人民協力；共謀農業之發展，以足民食；共謀織造之發展，以裕民衣；建設大計畫之各式展舍，以樂民居；修治道路運河，以利民行。

全國人民衣食住行之解決，即為民生主義之目標。古人謂：「政在養民」，而民生主義即以「養民為目的」（民生主義第三講）。實業計畫第五計畫，對於衣食住行等民生工業，闡述頗詳，蓋其原旨，即在於實現民生主義。抑民生主義之實行辦法，厥惟「平均地權」與「節制資本」二者。而「

平均地權（以求土地問題之解決，其實施步驟，則為「照價收稅」與「照價收買」以及「獎勵墾殖」，並漸進地求達到「耕者有其田」（民生主義第二講及建國大綱第十條）。考實業計畫之中，凡所規畫，莫不遵守此項原則。如建築標準，則標「居民極鮮，人為障礙，絲毫不可」（第一計畫第一部）之地，故北方大港主建築於青河灣兩河口之間，東方大港主建築於年浦神嶺前之開。至於沿海填地，以為公有；以及移民則主張「土地由公家買收，以防專占投機之虞，置土地於無用，而遺毒於社會國家，所得土地，應均為農莊，長期貸與農民」（第一計畫第三部）；均可見實業計畫對「平均地權」之實行，如何重視！

再就「節制資本」而言，則應節制者，乃為私人資本；至於國家資本，則不惟不當節制，更應以國家力量，促其發展。民生主義第二講曰：

外國富，中國貧；外國生產過剩，中國生產不足。所以中國不單是節制私人資本，還是要發達國家資本。

至於發達國家資本之方法，民生主義中曾舉出三點：一曰：交通事業；二曰：儲蓄；三曰：工業。實業計畫六計畫中，殆全以此三者之發展為主。由此可知實業計畫者，實為實現民生主義之具體方法；而民生主義，則為實業計畫之根本原則；二者相得益彰，缺一不可。

此外，實業計畫其他一切之內涵，亦莫不可於民生主義中求得解釋。例如：實業計畫之發展程序，有異於資本主義國家之發展程序者，此即在於到達工業化之過程中，當避免使社會發生不幸，如失業增加，貧富懸殊等現象是，實業計畫為首曰：

中國今尚用手工為生產，業人工業革命之第一步，比之歐美已臨其第二革命者有殊，故於中國兩種革命，必須同時並舉，既廢手工採機器，又統一而國有之。

民生主義第二講曰：  
要趕快用國家的力量來復興工業，用機器來生產，今全國的工人，都有工作。到全國的工人都有工作，都能用機器生產，那便是一種很大的新財源。如果不用國家的力量來經營，將來的結果，也不過是私人的資本發達，也要生出大富階級的不平均。

### 三民主義半月刊

所謂「廢手工採機器，又統一而國有之」，與「用國家的力量來振興實業，用機器來生產，與資本主義國家在發達工業過程中，任由私人自由競爭者不同。而其結果，則足以收「舉其功於一役」之效，並以免除將來之社會革命。此即「發達國家資本」之理論根據，而為實業計畫之真精神，亦即民生主義之真精神。

至在實業計畫之實施過程中，尤有不可不特加注意者：則為如何維護主權之完整問題，實業計畫序曰：

惟發展之權，操之在我則存，操之在人則亡。此後中國存亡之關鍵，則在此實業計畫之一事也。

而第四計畫第三部東北鐵路系統真鎮葫蘆島線則曰：  
依據與俄前政府所訂原約，不能在兩滿鐵路百里以內建築並行路線。但當施行國際發展計劃，為共同利益起見，此等約束，必須廢除。

於以見，總理在實業計劃中力謀保持主權完整之苦心，惟實業計劃原非專談理論之書，且係對國際而作，故所言尚不如民生主義所言之詳晰。民生主義第三講論吃飯問題曰：

中國之所以沒有飯吃，原因是很多的。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農業不進步，其次，就是由於受外國經濟的壓迫。

第四講論穿衣問題曰：  
我們要解決民生問題，如果專從經濟範圍着手，一定是解決不通的。

要民生問題能够解決得通，便要從政治上來着手，打破一切不平等的條約，收回外人管理的海關，我們才可以自由加稅，實行保護政策，能够實行保護政策，外國貨物不能侵入，本國的工業，自然可以發達。

又曰：  
中國的棉業和毛業，同是受外國政治經濟的壓迫。我們要解決穿衣問題，便要用全國的大力量統籌計劃，先恢復政治主權，用國家的力量來經營絲麻棉毛的農業和工業。更要收回海關來保護這四種農業和工業，加重原料之出口稅及加重洋貨之入口稅，我國之紡織工業，必可立時發達，而穿衣問題之材料，方能解決。

夫三民主義，固有其歸納性。故民主主義之實行，必領民族主義之同時實現，然後民生問題，真能解決。不然，則國家因受列強之經濟壓迫，自救之不暇，更何民生之足云？可見無論黨文往行各種民生問題，均必在國家主權完整之下，乃能獲圓滿之解決。抗戰勝利以後，解決民生問題之障礙，自隨之而去，惟國人於總理垂訓之深切，仍不可須臾忘也。

風上略已闡明實業計劃與民生主義之關係及其可以互相參證之處。此外，尚欲發一言：即總理對於民生主義第三講第四講之末，均莫不反覆叮嚀：人民對於國家，要盡義務。然則，實業計劃之實行，端在全國國民之忠實履行其國民之義務矣。

#### 四 實業計劃與國防建設

實業計劃與國防建設之關係，總說固甚詳，共言曰：

實業計劃一部署，其實就是一個偉大的國防計劃。如那裏要開闢河道海溝，那裏要構成鐵路網的中心，又應如何開採煤鐵礦產，與辦土鐵工廠、鍊鋼廠、機器製造廠、造船廠、造軍廠，以及如何發展衣食住行等工業，怎樣移民於西北，怎樣發展農田水利，智策著眼於國防上的需要，為國家民族策長治久安之計。名目上雖說是什麼東方大港，北方大港、南方大港、漁業港，其實都是軍港。所有鐵路中心和終點，其實都是國防戰略上軍隊集中的地點。實業計劃中一切的節目，無不有重大的國防意義，為軍事而準備的（總理遺教第一講）。

夫就國防而言，則民生問題應得解決以後，國防建設，始有所憑藉。故實業計劃十大綱領中關於純粹解決民生問題之各項，亦均可以國防建設視之。至於軍需工業之發達，必以實業及基本工業等為其基礎，尤屬顯而易見。再就純國防性之設施而言，則一國之國界，無外於陸與海二者。建築軍港，發達海軍，所以鞏固海疆；修築鐵路，移民實邊，所以牽制陸疆；此其意義，自更顯然可見。近世我國發展，偏於沿海，而西北北部，地曠人稀，交通梗阻，直如人之患半身不遂病者然。此皆確足以隔絕中國與世界之聯絡（參見第二節），而尤足使邊防空虛，安危可慮。試展覽地圖，環乎吾國陸疆之

國外各地，類皆鐵道縱橫，密如蛛網；與吾國西北相較，判若天淵。獨目歸心，其能毋不寒而慄乎！總理實業計劃，以北方大港置於第一，而以西北鐵路系統為各鐵路系統之冠，並繼之以蒙古新疆之移民，用意深遠，殊足發人深省！

總理著書之時，列強對我之野心猶熾，實業計劃原欲獲得國際之共同發展，為免引起列強之嫉視，並避就當時之事實起見，所言不能無所忌諱或故意略略之處。就建築海港而論，除在計劃中之三十一個海港以外，如蘇州、大連、威海衛、青島、香港、廣州等處，以其形勢與所控制之腹地而言，夫豈無一可列於計劃之中者？又如浙江之象山港，亦豈無無絕港之價值者？而原書均從略焉。蓋前者當時均為列強所佔領，而後者在軍事上之意義，極為顯豁，言之適足以招列強之忌，而阻吾計劃之進行也。夫在領土主權殘缺之下而謀建設，其措置自不能進退自如，從心所欲。從例有可以為證者：如「一九一八」以前葫蘆島之無港問題，用意則欲以抵制於大；抗戰以前一般人之反對粵漢廣九兩路之接軌，則以適足以促香港之發達而不免於為人作嫁。又如計劃由重慶直達西營之川廣鐵路，必以廣州灣之收回為前提；計劃上海之新市中心區，因適於租界之隔閡，不得不向江灣發展；凡此諸點，皆所謂「實備此」，故不得不爾也。實業計劃中其一部分所以諱言或略略之處，窺其用心，亦猶是耳。此實業計劃之所以難實為一部偉大的國防計劃，而全書之中，僅於第一計劃第三節蒙古新疆之移民，一佐以外國鐵道之士，及有軍事上組織才者」一語微露其意之故也。

今則不平等條約，已告廢除，我國國際地位，迥非昔比；戰後一切租地失主，概返原主，即如蒙古問題與香港問題，將來在友邦友好諒解之談判下，自均可獲得圓滿無極之解決。盟國之間，為製保東亞之和平，亦均希冀有二獨立強盛之中國為其安定力。此後吾國防建設，自無庸再事諱諱。則何在領土主權完整之前提下，就實業計劃予以補充，使適合獨立強盛之新中國之國防需要，斯誠全國國民及工程專家所應竭慮殫思，以求其實現者也。

#### 五 實業計劃之新義

總理實業計劃序曰：

此書為實業計劃之大方針，為國家經濟大政策而已。至其實施之細密計劃，必當再經一度專門家之調查，科學試驗之審定，乃可從事。故所舉之計劃，當有種種之變更改良。讀者幸毋以此書為一成不易之論，庶幾可。

其博大寬宏，不礙潮流之變，令人讀之，益增欽慕。然總理著書之時，其不能暢所欲言，無如前述；而鐵路線之不能實地掘掘，各種鐵路之未能普遍試探，與夫西北各地地理情況之難明確等等，自均為不可免之事實。是則戰後實施實業計劃，舉凡各鐵路線之應否部分改造，各地礦產開發之應孰先孰後，以及全國工業在地區上應如何分布等等，施行之際，自當有與原計劃出入之處。總理於原書之中，論及較細事時，必曰：「則余讓之專門家」云云；而東方大港之是否必建於乍浦漢口間，抑或仍以上海改造，遼東灣中之二等港，是否必建於營口，或以葫蘆島代之，以及熱遼遼河之開鑿，應在懷德以南范家屯與四重山之間，抑或在懷德以北青山堡與舞山屯之間，總理均無成見。是則讀總理書而膠柱鼓瑟，豈惟逆時無成，抑且有乖總理原意，而自卸其應負之責任矣。

今請基於此議，略論戰後實業計劃應注意之數點。戰後之我國，主權完全獨立，各佔領港灣以及台灣澎湖閩沙羣島（海南九小島），均重入祖國懷抱。在此情況下實現實業計劃，第一重要問題，厥惟移都北平。今人言建都，動以總理指定在南京為言，此殊有商榷之處。曹錕英士先生致黃克強先生書，論及總理於民元主張建都南京，有曰：

北京為兩代所都，帝王歲夢，自由之鐘所不能敲；官僚遺毒，江河之水所不能清，必使夫所惡者，方足鑄鑄專制餘孽，遷地為良，庶可滿灘一散瑕穢耳（孫文學說第六章附錄）。

總理當時主張建都南京，此為一理由。此外，尚有不得不遷者，蓋自八國聯軍以後，自北平經天津至山海關鐵路，有列強駐兵；大沽口及北平至海口一帶砲台，並遭撤廢；而旅大佔於日，威海租於英，使索為我內海之渤海，其領銜竟操於人手；至遼東半島日本別領，尤為強暴，甚者，北平城內，

三民主義半月刊

倘有所謂「使館界」，外兵外警，守備森嚴，無異「國家之內之國家」（中國之命運頁三四）。是則當時者以北平為首都，所謂「燕巢幕上」，與列強肆應周旋之不暇，更何能施展自如？觀夫以後之北京政府，無不與帝國主義者互相勾結，以禍國殃民，與其完全歸咎於北平軍閥之無恥，無寧謂為形勢所逼成之耳。且世界各主要國家，除英國即以其最繁榮之商埠為國都外，其餘大抵其首都所在，恆與其國中最繁榮之商港，互為表裏，如英倫華盛頓之皆是。實業計劃完成後，三頭等港中，其最發達之商港，厥為北方大港，其必成為我國最繁榮之商埠也無疑，而北平適居其腹地，特豐，必為我國之工業重心所在，尤當以首都置於其間，為其後盾與前衛，並益以促其發展，此尤非北平專屬。尤有進者，北平為國防之重心，而西北鐵路系統為在國防上意義最重大之鐵路，為振起國威，鞏固邊疆，亦宜移都北平，以全力完成西北鐵路系統。北平居世界交通要衝，將來亞細亞大陸之空中交通發達，北平尤當為其要站，是則北平在交通上之地位，又非僅當歐亞之側而已。况北平地位，最便於控制東北，策應朝鮮，以防日本之再起，而確保東亞之和平。

然則，移都北平，實為實現實業計劃之眉目，非如此，則一切施設，皆將無所附屬，亦既明矣。以總理之明，豈未見及此？觀夫實業計畫之置北方大港等於一計劃，微言奧旨，已約略可見。曹錕時首都，在於北平而非南京，使總理之意必欲民國未去北平而都南京也。則北方大港與東方大港之先後，必異於今日之序列。是知總理著書之主張建都南京，與曹錕時所擬曹佔領港等，同一「不得已」，若以辭害意，豈非善以一善，失之千里矣！

吾人既以移都北平，完成西北鐵路系統為實現實業計劃之起點，請再進而一論海港之建築問題。夫遼東山東兩半島，相抱如鉤，實為北平之門戶。而旅大與威海衛，其領銜也。故應將此三港，建為最堅強之海港，以資鐵錘。其東與海洋島，石島與青島，亦應建為軍港，使與旅大威海，各成犄角之勢，並加以強首都之外圍防禦。此外，如運籌港、舟山羣島、象山港、三門灣、福州、廈門、香港、西江口、廣州灣，均應使其兼具軍港作用，

或選擇而專建為軍港。欽州港口不及廣州灣優良，其二等港地位，應由廣州灣取而代之。台灣海南二島，為我國東南海中之二大島，亦即東南半壁之屏障。澎湖馬尾軍港及台灣島上各港，應切實加強。海南島上如海口及榆林港，亦應切實興建，以加強其與大陸之聯繫，並為海軍駐紮之所。至於戰後朝鮮之完全獨立，為我國安危所繫。故我國應盡切實扶助之責。並於其獨立以後，與之密切合作，以共同監視日本。冀朝鮮為日本到亞洲大陸之橋梁。朝鮮如不能完全獨立，且與我國合作，必貽大陸以後憂。徵之往事，其理益明。故無論為我國，為朝鮮，為東亞，乃至為全世界之安全與和平，必使朝鮮海峽與對馬海峽，在日本野蠻強佔未完全化除以前，成為吾人「隔聲遠度」與制止侵土之堅強不可逾越之防禦界線！

其次，實業計劃除原有之十大綱領外，為適應時勢之需求，似應增加航空，可分空軍與空運二者言之。就建設空軍言，北平宜建為我國北部一空军中心基地。使東北及西北之一部，均受我國大空軍之控制與翼蔽。並使遼東山東兩大半島，受其掩護，益增其抗禦首領之功。此外，沿海疆陲各適宜地點，亦應分別建立強大之空軍基地。同時，在腹地如西安、蘭州、成都、武漢等地，尤應建為各沿邊中心基地之中心，使其長距離之飛機，可與各沿邊中心基地，互相策應，而為其後盾。台灣與海南兩島，除在本島建立空軍基地外，並宜在福建廣東適宜地點，建立強大空軍基地，使該兩島，能獲得大陸空軍最直捷之聲援。然後，再在各地分別建立次要之空軍基地，以構成最密最強之空軍基地網，然後我國之空防，庶可有備無患。至純就空運而言，除國內航空網之完成以外，對國外之航空，尤宜促其發展。空運基地與空軍基地，大抵均可一地兩用，亦猶乎鐵路之可兼具經濟上與軍事上之價值也。故空軍基地網之完成，亦即空運基地網之完成也。對國外航空言，北平長春等地，可成為亞美兩洲之空運要站。迪化伊犁等地，可成為歐亞兩洲之空運要站。昆明等地，可成為亞非兩洲之空運要站。廣州上海等地，可成為亞澳美三洲之空運要站。將來均必求其有適應國際要求之設置。航空軍空運之發展，飛機製造原料之開發，與飛機製造工廠之設立，均應次第完成，然後

可以永保盈餘不降。凡此三點，不過以證明實業計劃之應隨時俱進，適生新義已耳。非敢謂言之有也。至於統盤計劃，綱舉目張，悉合機宜，更非予之所及已。

### 六 結語

年來國內明達，已察悟實業計劃之重要。好學篤行之士，且有實業計劃研究會之組織。其研究之成績，予雖未獲親其底蘊，但其用意之善，則無可議。至於總裁之於實業計劃，尤其決心。其對於實行實業計劃最初中年內所需用之人才與物資，且均已預備之計。中國之命運實一四九——一六二。夫就 總理之學說言之，天下事無其不能知，不慮其不能行。今後實業計劃之實現，端在國人之行之耳。茲者，勝利已近，亦即實業計劃付諸實施之期在適，我全國同胞，允宜急起研習，以了其首經，並進而進行準備，庶免臨事倉猝，致又積延時日，遺憾無窮。願憑依關，世運所繫，區區不憚辭費之意，在此而已，至盼讀者諸君，進而教之。

### 本刊下期要目預告

- 五權憲法中的司法建設問題..... 張知本
- 今後中國之國際地位..... 劉道誠
- 限制私有土地芻言..... 丘式如
- 國父民生主義與汪安石底經濟政策..... 羅道誠
- 三民主義教育首學述要(續)..... 葉琦
- 五五憲章教育宗旨條芻議..... 陳龍宗
- 黨內的軍閥..... 鄧公立
- 中華革命黨史事兩則..... 希汾輯

# 建設新西北芻議

羅先高

邦爾兆雄，禍起濟陽，日寇侵凌，東北淪陷。於是「調查西北」一詞發西北「建設西北」之呼聲，曾一度轟鳴入雲。迨蘆溝警報，遂勃一時之西北建設運動，却突形消沉，後以東南省海各省失守，於是國人政府皆羣集集中建設西南，致使西北未曾獲得與西南平權發展之機會；究其原因，約有五端：(甲)人皆認爲西北之氣候與物質環境較西南差，就建設難易論，建設西北不如建設西南。

(乙)就對外交通論，西南較西北便捷。

(丙)西南原有工業經濟基礎比西北好。

(丁)國都西遷，止於重慶，位近西南，於是各方智能之土金融資本等皆集中於西南各省。

(戊)因漢北各省之淪陷，西北隣近戰區，國人以其非安全地帶，爲策久計不如建設西南。

然自太平洋戰爭展開，緬甸淪陷，西南國際交通閉塞，時勢轉變，於是西南又非能任吾人安全活動之場所矣。因之建設西北之聲浪應時代之急備，隨軍事之好轉如潮騰湧再度高漲。如春花之放蕾，如秋雷之初震。

但目前論建設西北，應着重於提供如何能使西北建設成功之方案。自無再強調西北重要性之必要，但對西北之瞭解亦應有少許之備認。茲就其範圍、史略、價值、與危機四項略加說明，藉作討論本題之參攷：

(一)範圍：近人對西北領域範圍歸納其意見計有四種不同之見解：

(A)最廣義之西北(總理實業計劃中所指西北鐵路系統及擴張西北鐵路系統之西北)包括黑龍江、內外蒙古、西藏、甘肅、陝西、青海、新疆、新疆、及西都蒙古。

(B)廣義之西北(陝西、甘肅、甯夏、青海、綏遠、新疆、及西都蒙古)。

(C)最狹義之西北(僅領有陝西、甘肅、甯夏、青海、新疆五省)。

(D)普通說法(包括陝西、甘肅、甯夏、綏遠、青海、新疆六省)。

此種區域上之異說，雖無明確規定，要不外以政治區劃及自然地理區劃爲標準。吾人爲研究建設便利計採取政治劃分。但因蒙古自獨立後，情形特殊，已非吾國政治所及，西藏稍長數年政治支配區者，且日俱出產。黑龍江與內蒙古大部分業已淪陷，故吾人原論建設西北之區域採取最狹義之範圍，(兼或論及較遠未曾淪陷之一部)此則名之曰小西北，亦所欲建設之新西北也。而以最廣義之西北爲大西北。一俟戰勝，自當積極建設大西北而得完我總理之遺志也。

(2)史略：西北不僅爲中華民族之發祥地，而且是東亞文化之搖籃。有廣漠之沃野，蘊豐厚之寶藏，賦山川之勝，據形勢之險。周秦漢唐鼎盛之代無不建都於此，當時文物之茂，極備奇偉，不惟冠全國，亦且震世界，後以人口繁殖日多，乃漸順黃河而長江，而珠江，遷徙於東南，因東南漸海，交通較便，物產較富，遂乘機若鶩，而弗顧西北，致有今日之荒涼冷落。漢張騫鑿空西域，闢國萬里之奇勳，當時臣服於漢者有卅六國，掩有今日俄屬中亞細亞，阿富汗，印度，伊朗，高加索，阿拉伯等地，均據歐亞，實爲赫赫可觀。秦時徙天下富豪十二萬於咸陽，開鄭國渠勸農以興水利。漢代內開河渭，以利漕運，所謂「河渭漕挽，西給天下」(亞良語)外則通西域，使者相望於途。唐天寶元年西安領戶卅六萬二千餘，口百九十六萬。工商輻輳，國外貿易者絡繹於途，此固古代西北經濟盛況也。周秦漢唐均先後定都長安，故晉四代政治上之光榮，亦乃西北政治上之光榮也。故當時之長安一方爲香客集居之所，一方又爲華化漸被之中心。夫此昔日西北之偉大豈偶然哉！

(3)價值：提及西北，人恆閉自秦思斯乃萬山磅礴，流沙橫互，高原寒冷，朔風怒號的黃沙彌漫，遊蕩千里，地曠人稀，風物蕭疏之區也。然西北在國內政治經濟文化上之重要，吾人均可自極簡之史乘中覓得，以觀今日之東南，正可先後媲美也。且如天山南路一帶盛夏積雪溶解，流

灌田野，湖草葑蕀發碧如茵，花木成行，夏日溫風，不遜江南。塔里木伊宰二河谷，平原沃壤，沮洳低窪，遙遙相接，故多良田腴土，春和日暖之際，孔雀舞較之翠鴉如舞，何所謂「新設揚柳三千里」，引得春風度玉關。秦隴邱原，綿麥遍野，皋蘭山麓，青海原頭，賀蘭山畔，以及祁連龍首之間，天山南北之內，牛馬駱駝千百成羣，山綿羊動所屬計，凡有水之處，即人烟棋布，遠樹連雲，又「秦麻嶺」中，地產城麻，依然漢代觀。且西北地大物博，天賦雄厚，實為科學家之天地，企業家之新大陸也。其延綿不斷之高土，一萬千里之大川，汪洋無際之內海，莽海無垠之沙漠，更可謂首出偉天之精氣，以之立業可以驚天地，以之思想，可以貫通古今。故西北雖不無缺陷，可是尤有其優越之點，茲就其形勢，官商人口三點分述如下：

(A)形勢：甲、在戰略上：秦隴關中，削平羣雜，遂享有天下。漢武通西域，擊破大宛。唐平突厥回紇（今之內外蒙）征高昌黨項（今之新疆）及吐谷羅（今之青海）等地，并以甘肅青海為根據地進平烏魯木齊之土番（今之西藏）。造成歷史上空前未有之豐功偉業。魏晉多事中原，弗顧西北邊防，遂成五胡之亂。宋受遼金夏之寇，不能保西北，結果被遼偏安遼方，貽萬世之羞。此誠所謂得之者昌，失之者亡。故歷代戰爭，中山「西北」伐「東北」，由「東南」取「西北」，即以此今之形勢論之：一、當可控制晉冀戰場上敵人之側方，一面可源源接濟我軍北方之補給，並且隨時可從陝綏漢長徵斷敵之南北之聯絡。包抄敵後根據地，攻取遼吉，收復朝鮮，皆如指臂而下也。退守方面，狼山賀蘭山脈均在兩千公尺以上，足以控扼河套沿河之交通，蘭州東北皆乃高原山地，攻取甚為便利，瀧關固鎮，黃河天險，此固皆今日敵軍專地帶池一步而獲西北也。故西北「實為一進可攻，退可守」之險要軍事地帶。(乙)國際交通：目前備西北公路亦為敵人不能斷斷之生命線。若總理西北鐵路系統直達廣州大計劃實現，或歐亞長途航空通行則此兩大洲未來之關係發榮光大，必倍倍倍倍。故將來西北各區成歐亞交通之樞紐之時，其價值之大，有非想像所能及者。

(B)資源：西北地廣物博，凡戰事所必須之資源無不具備，陝西關東河套及新疆準噶爾塔里木盆地盛產農作物，渭河流域富產棉花，甘肅青海富產羊毛，秦嶺、天山、祁連、洮白等區之森林，新疆青清之金、新、青、南、之銀、陝西之銅，陝西之錫，新疆全部陝之渭河流域之鹽，從新疆北部塔城、烏蘇、迪化、等地傍天山山脈經甘肅之敦煌玉門酒泉延入陝西中部之延長延川府鹿鹿縣盛產石油，產量占全國之半，其蘊藏

量在世界亦占重要地位。甘肅新疆產量亦大有可觀。其他如玉、煤、硝石、硼砂、石膏、汞、鈾等蓄積量均甚其間尤以新省蘊藏最富。同時西北可供開鑿之鐵道計在十萬萬噸以上，故苟稍致力於開發墾闢之勞則取多用途，實有限量。

(C)根治人口：今天休博士於中國人口問題之解決方法一文其中有云：「根本根治中國之方，能在於人口適當之分配……故之國情推移民移民二法。」總理於建國方略中更曾明示吾人曰：「假定十年之內，移民之數為一千萬，由人滿之省移於西北，樂於自然之樂莫有偏於商業界之利益當重矣。」值茲烽火正熾，良鴻遍野之時，物產收穫缺乏之際，但今西北則數百里無人烟，地廣物博而人稀，據統計之人口每平方公里僅有五人，甘肅一七人，青肅一七人，新疆二、四人，青海一、五人。倘能趁此時儘量移民西北，從事開發，不僅有益民生，而國防亦日從固矣。

(4)危機：西北地域廣大，交通阻塞，民族複雜，文化滯滯。昔者處於外患內憂交迫之國勢下，政府對之實有鞭長莫及之嘆。關中之沃野而荆棘荒蕪，唯險阻而萌頹廢，廣宇自荒，誠堪惋惜，遂使長城自壞，任人覬覦者久矣，於是俄人倡滿蒙處分之說，赤化新省，英人亦曾倡印藏合併之說。日本則由東北而舉北，由華北而舉綏，故滿左宗常有云：「西北臂指相聯，形勢完整，自無隙可乘。若新疆不固，蒙古不安，則特甘陝山西各邊時虞侵軼，防不勝防，即直北關山亦將無安眠之日矣。」故西北為國防最重要之地帶而在體節亦外患最急之邊區也。直至全球烽火迷漫，邊情無暇他顧，其勢始稍緩年。故此亦為我建設新西北之良機也。再者西北外雖患患，而內憂亦不容吾人漠視者，實過於中共表面服膺中央，而有出賣祖國之質，私自擴充地盤，侵及甘肅青寧等省，違法干紀，不擇手段，禍國殃民，未有降於斯者。此種行為君不及早糾正不不第為西北一大危機，亦將為中華民國前途一大隱憂也。

是故吾人於此千載一時之良機且寇深禍急之日建設新西北，誠為急不容緩之事也。夫封豕無外，當行壯偉之謀。肝胆相期，宜共艱危之濟，激蕩夏巴沮之氣，消東亞未來之憂，是存肩之重任，豈容旁貨。故 總裁所勉於國人者曰：「西北好建國之根據地」，豈無故哉！

# 總理倫敦被難時的靈修

陸丹林

總理在廣州主持第一次舉義失敗之後，即轉香港，東渡日本。不久，即轉美洲，繼續宣傳持滿，繼而到英，發生倫敦被難事件。總理在英國時，心理建設第八章有說，「然當時余之遊美洲也，不過為初期之播種，實無大影響於革命前途也，然已大暢清廷之惡矣。故於南抵倫敦之時，即遭使館之難。我致不測。幸得吾師陳君竭力營救，始能脫險。此則留島之還運，真有天幸存焉」等語。這簡單的敘述，在只末一句「真有天幸存焉」，和他所編的相參證，實含有深意於其間的。

當民國前十六年（公元一八九六，光緒廿二年丙申）的秋天，總理在倫敦被清公使照會禁錮的時候，監視正嚴，沒能和外國通達一些消息。總理當時事急智生，即向使館英漢對切談話，果然得着大效。總理在「倫敦被難記」曾有如下的記述：

「柯爾於理事犯之名稱，若未能領會，余乃叩以平生於阿美尼亞人之歷史，亦曾有所聞否？柯爾領之。余遂迎機以導，告以中國皇帝之欲殺余，論土耳其蘇丹之欲殺阿美尼亞人，土耳其蘇丹之所疾視余為阿美尼亞人基督教徒，故欲殺而藏之。中國皇帝之所疾視者，為中國之基督教徒。余即中國基督教徒之一，且曾靈力以謀政治之改革者也。凡英國之人民，無不同情於阿美尼亞人者，故余之身世及余目前之情況，均為英國所熟知，則其表同情於余，亦不啻而可決也。……君試思救人於死與致人於死，其善惡之相去若何？又試思吾人盡職於上帝為重要乎？抑盡職於僱主為重要乎？更思保全正直之英政府為重要乎？抑助腐敗之中國政府為重要乎？君其三思吾言！」

總理這一翻話，義正詞嚴，使得柯爾切而又頓誠。柯爾聽着，大受感動，答應特 總理傳達消息。在表面看來，只是引證確切而使柯爾易於了解罷了。其實，總理那時是盡重心靈上的修養，明白的說，就是宗教的靈修。在柯爾把信息帶出之後，總理當過當時的心境有說：

「以是備余知歸告之誠，果達於天也。以是余知上帝固默加阿護者也。余自被逮後，衣未嘗解帶，夜未嘗安眠，至此，如酣然一睡，及且而醒」。由此看來，總理那時的精神何等與感召如何，也可知了。他在被拘禁的十二天之中，每天的生活怎樣呢？我們可以看出他從被捕出獄後自由之後，寫信給香港道濟會堂長老區鳳藻的信，更加證明他心靈修養是怎樣的誠篤，今摘錄如左：

「……弟身在牢中，自分必死，無再生之望。窮則呼天，痛癢則呼父母，人之情也。弟此時，惟有縮心懺悔，懇切祈禱而已。一連六、七日，日夜不絕祈禱，愈祈愈切，至第七日心中忽然安慰，全無憂色，不期然而然，自云此祈禱有應，精神施恩矣。……而可為我傳消息者，終必賴其人。今既蒙上帝施恩，授我祈禱，使我安慰，當必能感動其人，使肯為我傳書。去早，他入房中，適防偶疏，得乘間與他關說，果得允肯。……幸天心有意，人謀不臆，雖清房監禁，終無我何，適足以揚其無道殘暴而已。……弟謹此大誓，俾從神道而入治道，則弟幸甚，蒼生幸甚。」

這些話充分表現 總理當年的宗教生活。區鳳藻是 總理的漢文教師，曾任德國柏林大學漢文教授。這封信原稿，區氏後來轉送給麥梅生長老。民國廿九年，我在香港，梅生曾把原稿給我看。此信開始和信末，都沒有上下款，也沒有年月日寫上，是恐怕被檢查款有遺漏而若出是非。好在收信的信寄信的相知很深，一看便知何人筆蹟的了。

祈禱，在宗教家看來，是最重要的靈修。佛家有面壁九年的故事，一般和尚都注重祈禱。儒家如曾子，有「吾日三省吾身」。耶穌未傳道之先，即在曠野禁食祈禱，這些都是精神修養的事實。總理本著大無畏的精神，崇高偉大的人格，克服一切艱難險阻，戰勝無數敵人。靈動的根柢，和飽平日的精神修養，關係很大，倫敦被難，得以脫險，後來追述的經過，就是確確實可信的事實，即如現在國社團開會，靜默三分鐘，含義也很大，一方面是感悼，一方面是省察的呢。

